

和平示威是公民權！立即修改公安惡法！



立法會舊瓶舊酒



參選專頁



台灣人民的決定必須受到尊重！

日本棄改和平憲法 駐韓美軍協定現狀

中國：市場經濟導致生產很不安全

聲援學聯同學！爭取修改公安條例！

社論

警方日前拘捕5位專上學聯成員，進行認人等手續，作出正式起訴的準備，罪名是在6月26日參與及協助未經批准的集會。

這是一種政治迫害，意圖轉移港人日益增高的不滿特區政府和特首施政的視線，選定目標人物去打壓這些富有正義感、敢於積極反對不合理事物、支持弱勢社群爭取權益的進步學生，企圖阻嚇他們及其他人士不再過問政治、參與社會和學生運動。

警方的打壓是有計劃有步驟的。6月26日，學聯抗議人大釋法一週年，遊行到政府總部；警方把他們攔截於終審法院門外，他們就在那裡靜坐。次日清晨，他們正依警方指示移往示威區的時候，卻遭到暴力清場，學聯多位負責成員都遭到追噴胡椒噴霧、被大力抬起扔在地上、抬上警車。請願示威者及其他參加的市民，當時的行動是和平、理性的。港人從電視或傳媒報道上，都可知道他們並沒有激烈的行動；看到的反而是執法人員以胡椒噴霧以及從後揮拳攻擊這些和平請願者。

特別是，執法人員當時完全沒有執行其內部指引所規定的噴胡椒噴霧4大程序：1、先作口頭警告；2、應在兩呎以外距離噴射；3、噴後要即時為傷者淨化；4、詢問傷者有無嚴重疾病或受藥物影響（見8月17日《明報》報道所取得的指引內容）。被近距離噴射中的請願人士，同去年石湖墟警民衝突事件中被噴中的區議員一樣，醫生檢查發現他們的眼角膜受損。在外國，已有胡椒噴霧引致傷亡的案例。警方在事後遭到公眾指責，寫出了有關的報告。但上報後多時，高層卻緘默不提，久久不予發表，反映出警方的理虧見不得人，否則他們就應立即公開那份報告，並承認鎮壓人民的罪責，起訴有關的執法人員。

可是，當局卻完全反其道而行。正如學生所譴責的，他們「惡人先告狀」，以先下手為強，要拘控當日的被打壓、被襲擊者。

警方所用作拘捕「理由」的，是他們5人違反了《公安條例》。但這條惡法是臨時立法會加以修訂通過，顯然踐踏了國際人權公約和基本法所規定的集

會、示威、遊行、請願的自由權利的。據上引8月17日《明報》社評指出，「當時曾引起不少法律學者和人權組織的關注，恐怕集會前必須向警方申請批准的規定，會成為政府侵犯和平集會權利的工具。律政司司長梁愛詩曾再三保證，這項規定，只是為了讓警方及早部署，確保集會不影響交通和公共秩序；警方不會僅僅為了集會組織者沒有事先申請，便不准集會舉行。」但現在，卻以沒有事先申請為「理由」，準備加以控告。這不但違反了國際人權公約保證人人有集會自由的規定，而且連律政司的上述承諾也自行加以毀棄了。

拘控學生的行為是如此橫蠻無理，以致立即激起本港32個社會團體和2百多位人士的聯署聲明：「強烈譴責政府政治迫害」；而且，中大和港大校方也前所未聞地主動提出安排律師等義助被拘學生；70多名本港8間大專院校教授講師則罕有地聯署，聲援5位學聯成員，要求港府不對他們提出起訴。在各方面激烈而強大的壓力下，律政司表示當局仍未決定是否提出起訴，以此作為緩兵之計。但必須繼續加強反對力量，才能迫使當局最終停止有關的迫害！

我們十月評論社全人贊同上述的「強烈譴責政府政治迫害」聯署聲明的立場和5點要求：撤消控罪，停止迫害，修改違反國際人權公約的《公安條例》，公開「胡椒噴霧事件」的調查報告，等等。

可以預料的，當局意圖以鎮壓進步學生阻嚇人民參加社會政治活動、只做聽話順民的計謀是不會得逞的；相反的，這樣勢將會激起更大的民憤、反抗和鬥爭。

2000年8月28日



■「六二六」事件，學生和平集會，警方卻暴力清場，現五名學生被拘，難怪被譏「惡人先告狀」。

和平示威是公民權！ 立即修改公安惡法！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

特區政府繼拘捕十多名參與本年六月二十五日「悼念人大釋法一周年」遊行及翌日「胡椒噴霧事件」的請願者後，再度以公安惡法拘捕五名曾參與本年四月二十日「反對大專分科收費」大遊行的同學。雖然至今還沒有正式落案起訴，但已表現了現時《公安條例》的不合理，同時也顯示出政府對社會運動打壓的惡相。

我們堅信，政府的權力來自與人民的契約：人民授權政府行使統治權，最終以保障人民利益為本。不過，人民擁有「不可退讓」的天賦人權，意思便是當政府違反人權時，原本的契約便自動取消，人民有權反抗，甚至不遵守該法例或政策，挑戰政府的統治權威及法統。

公民抗命是一種建制以外的抗爭形式，當人民行使公民抗命權時，所有行動都是公開及理性的，並盡力以和平方式進行。更重要的是，公民抗命者有著一種自我犧牲的精神，這指公民抗命者是在以身試法，並願意承受法律上的責任，願意付出違抗法律後的一切後果，包括坐牢及被殺。公民抗命者憑著這種「自我犧牲」的精神去顯示法例或政策的不公正、不合理性，引起社會的道德同情及令人民效法這種行動，使該法例或政策不再執行，最終迫使政府修訂法例或改變政策。

根據現今的《公安條例》規定，舉辦遊行和集會活動，必須於最少七天前向警務處處長申請，並要取得「不反對通知書」才算合法。要取得「不反對通知書」意味有關部門有權審查並拒絕市民舉辦遊行和集會的權利，而事實上警方亦曾拒絕有關申請。這抵觸了《基本法》第 27 條中列明的香港居民享有遊行示威集會自由，以及違反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學聯一直認為經臨立會修訂的《公安條例》違反基本人權及《基本法》，故行使公民抗命權，堅持不申請，但為了方便警方以保證遊行集會可以順利進行，每每於集會前二十四小時以電話通知警方有關是次遊行路線等資料以便獲得妥善安排。多年來雖有不少行使公民抗命權利的和平抗爭者被政府起訴及判刑，但前人的犧牲表現了法例的不合理，後來者必會前仆後繼，直至成功爭取修訂公安惡法為止。

政府兩次拘捕示威者，顯然是有針對性的。近年不少民間團體所舉辦的社會行動都沒有根據《公安條例》向警方申請，但警方一直沒有採取拘捕行動。此時此刻，警方選擇性地針對有關反釋法的行動，而棄用其它事件，明顯是利用八月二日入境大樓的慘劇，社會產生了一股反內地人的情緒時，使請願者不易因被恐嚇及起訴而獲得社會同情，使政府最終達到打壓社會運動的目的。而「420 事件」被追究的名單中，包括了中、港大學生會會長、副會長、外務副會長，顯示警方正在挑選學生組織中職務最高及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加以打壓，其針對學生領袖和組織的目的至為清楚。

過渡三年來，政府亦不斷分化社會，左派背景機構又不斷以文攻武嚇增加打壓學生組織的力量，大肆抹黑學生組織，把學生和平理性的行動形容為文革時代的紅衛兵，把學生爭取政制民主社會公義的目標誣蔑成所謂「倒董」陰謀。由 420 查證事件、626 胡椒噴霧事件，到後來針對七一遊行向學聯發警告信，均見政府對學生以社會運動的步步進迫，兩次拘捕事件絕非個別事件。

警察是執法者，其根據法律(即使是惡法)辦事本無可口非，對請願者的拘捕亦可理解。可是警方在要求請願人士回警署協助調查及落口供的過程中，恐嚇的行動及言詞無所不用其極，不但利用港人內地子女法律知識有限，恐嚇其作不利的證供（法律上證人有權保持緘默），而且還恐嚇及騷擾請願者及其家人。而大部分與警方接觸的請願人士，都遭遇類似情況。如今，警方一直拖延處理該案，令請願者為案所困，迫使其日後進行社會行動時有所顧忌。這種極權國家的慣用技倆，居然發生在今天的香港，實在教人心寒。

兩次拘捕事件可見《公安條例》的確確被政府用作打壓社會運動的工具，只要公安惡法一刻存在，要求修改惡法的運動都會持續下去，我們誓不罷休，必將抗爭到底！

強烈譴責政府 政治迫害 (聯署聲明)

發起團體：香港專上學生聯會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一直反對違反人權的《公安條例》，認為市民擁有公民權利參與遊行和集會等活動，而不需要經過任何審查程序。首先，《基本法》第27條已清楚列明，「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再者，《基本法》第39條同時限制了《公安條例》不得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有所抵觸。但是《公安條例》卻規定，舉辦遊行和集會等活動，必須於最少七日前向警務處處長申請，並取得「不反對通知書」才算合法，取得「不反對通知書」變相是另一種審查制度，違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規定：和平遊行和集會的權利應被承認，對此項權利的行使不得加以限制。

回歸前，北京政權宣佈《香港人權法案》中部份條文於回歸後廢除。回歸前後，行政長官辦公室提出修改《公安條例》，再由缺乏法理依據及民意基礎的臨時立法會通過，使公安惡法成為了特區政府壓制反對聲音的其中一種強大武器，政府官員，包括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經常以「非法遊行」、「非法集會」、「影響公眾秩序」等言詞為藉口，肆意打壓市民應有的遊行權和集會權。政府一直刻意迴避公安惡法違反《基本法》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原則，而還原公安惡法，足見政府有心打壓民間力量，試圖把民間活動操縱於當權者手中，扼殺市民的公民權利。

自從臨時立法會將《公安條例》還原，公安惡法已大大限制了市民參與和平遊行和集會的權利，警務處在回歸後亦曾多次否決民間團體的遊行和集會申請，已充份反映了公安惡法的威力。自從8月2日「入境處事件」發生後，先後有多位曾參與6月25日「悼念人大釋法一周年」大遊行及／或6月26日「胡椒噴霧事件」的請願人士收到重案組的電話，要求他們到高街警署刑事偵緝總部協助調查，並已或準備落案起訴他們在6月25日至6月26日期間「組織非法遊行／集會」、「參加非法遊行／集會」或／和「阻差辦公」等不同罪名，我們對於警方有意提出起訴表示十分震驚和憤怒。

我們一直採用「公民抗命」的形式抗衡公安惡法，亦因公安惡法的不合理和違反人權，警方已多年不敢執行公安惡法，以「非法遊行」等類似罪名起訴請願人士。如今，警方再次使用《公安條例》，公然打壓請願人士，香港的自由空間更加遭到扼殺，公安惡法的威力已不止於阻止遊行和集會的舉行，而再進一步地起訴參與和平遊行和集會的請願人士，試圖對請願人士秋後算帳。

另一方面，在6月30日保安事務委員會的會議上，警務處行動處處長李明達曾承諾會就「胡椒噴霧事件」作出全面調查，於8月1日向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提交報告。在同一

個會議上，葉劉淑儀亦承諾會公開調查報告。6月26日的「胡椒噴霧事件」，警方使用胡椒噴霧鎮壓請願人士，警方有意和有計劃地製造混亂場面。但是，到目前為止，這份調查報告仍未公開，再加上警察投訴課仍在處理請願人士的投訴，卻在這個時候準備落案起訴請願人士，司馬昭之心，顯而易見。

再者，我們對於警方的處理手法表示強烈不滿。警方在聯絡請願人士的過程中，亦曾與請願人士的家人聯絡或接觸，當中警方的言論有誇張、恐嚇之嫌，令到請願人士的家人受到不必要的騷擾，亦產生不必要的疑慮和擔憂。現時被警方起訴的名單中，有的曾經在6月26日的「胡椒噴霧事件」中被警方用胡椒噴霧襲擊受傷，有的在警方暴力鎮壓和平靜坐人士的過程中被警方打傷，有的在「胡椒噴霧事件」後到警察投訴課投訴有關警員等，足證警方已經鎖定目標，有計劃地選擇請願人士，並準備落案起訴，有對「胡椒噴霧事件」作出政治報復之嫌。這次政府掀起了近年來最大規模的政治迫害行動，令民間社會陷入重大的危機，市民處身於白色恐怖，一片惶恐之中。如此行為，令人髮指，我們對此作出強烈譴責。我們絕不會屈服於強權欺壓之下。

最後，我們強烈要求：

- (一) 政府立即撤消所有對請願人士的控罪；
- (二) 政府立即停止對請願人士作出任何形式的政治迫害及欺壓；
- (三) 警方立即停止對請願人士及其家人作出任何形式的騷擾；
- (四) 修改違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公安條例》；
- (五) 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公開「胡椒噴霧事件」的調查報告。

**32 個團體及
205 位人士聯署**

抗議鎮壓學運 反對惡法治港

警方於日前拘捕多名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代表，指控他們「協助組織、參與未經批准集會」，當中兩人更可能被加控「阻差辦公」。我們認為，警方近期對學生組織的一連串打壓，目的是要收緊市民遊行集會的權利，同時藉此打擊近期蓬勃的學運；對於警方鎮壓學運的行徑，我們表示強烈抗議！

警方賴以指控學聯代表的《公安條例》，是一項「惡法」，尤其於 1997 年經臨時立法會修改過後，《公安條例》更出現大倒退，進一步成為限制、打擊市民和平示威權利的政治工具。《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清楚訂明，人民和平集會的權利必須得到尊重；不過，《公安條例》卻硬性規定遊行集會必須預先獲得警方發出的「不反對通知書」才可舉行，這種預先申請及審查的制度無疑是對人權的極大侵犯，我們表示堅決反對！

今次警方打算以「協助組織、參與未經批准集會」罪行起訴學聯代表，正突顯出《公安條例》的荒謬！一個和平的示威行動，只因沒有警方批准而舉行，有關的組織者及參與者便要面對刑事起訴，這到底是怎麼樣的社會？

我們一群過去曾參與過本港大專學運的人士，對於警方鎮壓學運、侵害人權的行徑深表憤怒，並嚴正要求當局：

- (1) 撤銷對學生的任何政治起訴行動；
- (2) 立即修改《公安條例》，保障市民遊行集會的權利！

343 位人士（聯署聲明）

徹查及防止對學術自由的干預！

軍行

對干預的揭露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主任鍾庭耀於7月間向外界披露，港大校長鄭耀宗透過副校長黃紹倫兩次傳話，說特首和校長不滿他關於特首及特區政府表現所進行的民調，要求他停止這種民調，並答覆何時停止。

這項披露使社會人士大為震驚。如果屬實，就是當局公然干預大學的學術自由；而港大校長則屈從於外來政治壓力，加以奉承，強迫下屬停止這種民調工作，成為扼殺大學學術自由的幫兇，喪失了作為校長的資格。

由於事態嚴重，而鍾庭耀所提及的有關各人都對鍾說的重要情節加以否認，校務委員會（下稱校委會）於是成立調查委員會（下稱調委會）對此進行調查聆訊。

鍾庭耀的行動實際上是向社會控訴，挑戰權貴和政治體制之壓制學術自由，因而在初期遭到各方面的圍攻，指責他提不出證據，無中生有，沒有誠信。鄭耀宗和路祥安的三個代表律師更運用其專業本領和特質，好像在雞蛋裡找骨頭般，向鍾猛加盤問，質疑鍾的指控，以圖替其「僱主」洗脫罪過嫌疑。

路、鄭兩人在聆訊時再次否認鍾的指控，說他們並沒有干預鍾的民調工作，更無傳話要鍾停止調查，也未聞特首曾有此意。但鍾提出當日曾有信交黃紹倫轉覆校長，認為「停止民調是不智的」。黃紹倫對此事並沒加以否認，只是說該信和鍾的另一有關文件都「失蹤」了，而對於其他一些關鍵性事情又表示記不清楚（這種選擇性地「失憶」，與鄭、路如出一轍）。後來，港大副校長程介明和政策研究中心負責人麥列菲分別向調委會供稱：99年5月11日，鄭耀宗提及他與董建華直接會面，談及三項「政治事件」，其中一項是董建華對鍾的民調負面結果表示關注。程介明更說：「今年1月的高層管理會議有討論過鍾庭耀的民調，當時他在會上聽過『接近特首的人』關注民調。在此之前的三、四次會議，他也聽過

類似的說法。他又在最少一、兩個場合聽過校長說有特首或接近特首辦的人不喜歡大學所作的調查，而鍾庭耀民調則最少被提及過一、兩次。」（8月16日《明報》報道）

加上其他人的證供，使調委會最後作出報告：調查發現路祥安及鄭耀宗均沒有全面及如實地公開他倆會面的談話內容，是「不好和不誠實」的證人；而路曾表達關注鍾的民調工作，並引發校長採取行動，導致黃受命於校長，向鍾傳遞一個構成抑制其學術自由權利的訊息。調委會認為，根據鍾曾寫信回覆校長，其與上司吳啟宏及陳婉瑩的對話，均支持鍾的供詞，故調委會相信其供詞，認為鍾誠實可信。調委會這些結論，更加證明鍾的上述指控是真實的。

校政要獨立自主、民主化

部份真相被進一步揭發，也證明港大學生會一早提出要鄭耀宗辭職的主張是正確的、必需的。贊成這個要求的人日益增多。超過半數港大教職員聯署要求校委會接受調委會的報告（亦即肯定對鄭、黃的指責）。許多教職員更提出鄭應該辭校長職。全港絕大多數輿論也對他倆大加譴責。在多方面非常強大壓力之下，鄭、黃兩人終於提出辭職了。這就是鄭耀宗向上諂媚、向下施壓、協助干預學術自由的可恥下場！在這次鬥爭中，以會長張韻琪為代表的學生會，起了勇敢而出色的先鋒作用。

可是，校委會內的成員，大部份來自校外的商界，他們部份由鄭耀宗選擇而推薦（其中不少與鄭有交情），部份由身兼校監的特首委任（這種制度同樣在其他大學實行），他們又幾乎都是保守的。這次連同少部份的校內委員，竟構成多數不同意校委會正式接納調委會的報告，意圖藉鄭、黃辭職草草結束這個事件，使報告不了了之。校內師生主張接納調委會報告的普遍要求，竟然受校外一小撮富人所阻撓。這又是外來力量干預港大內政的另一種表現，證明校委會必須徹底改組，應由港大師生民主地普選出全體委員

組成，實現校政獨立自主；校長也應由全校師生直選產生！廢止由行政長官兼任校監！

必須徹查整個事件

由於特首以「尊嚴」為「理由」拒不出席聆訊，上述報告沒有提及特首的角色；但在一些證人的供詞中，已指稱特首及路祥安與鄭耀宗會面曾「關注」港大的民調。這就構成整個事件的起源。因此，即使報告不加指明，誰干預民調，港人也已「心知肚明」。

路祥安不但干預港大的民調工作，而且也曾干預中文大學的民調工作，只不過給中大校長和民調負責人拒絕而不得逞吧了。

但他拒不承認事實和錯誤，在矢口抵賴之餘，還要浪費港人的金錢，聘用兩位大律師（據估計超過50萬港元）為自己強辯。既然事件由他造成，就理應他自己答辯；即使他要聘律師，也須由他自己付款，港人絕無義務要間接地付出這大筆費用。在校委會收到調委會報告，要開會決定是否公開它的時候，路祥安竟向校委會發律師信說他拒絕接納報告，律政司則公然去函校委會要求暫時不公開它；同一時候，特首又與楊鐵樑談了15分鐘，楊事後只說特首希望他「好好地處理」。這些都是當局進行干預的最新例證。

畢竟，兩個大律師並沒有隻手遮天的本領，路祥安的所作所為已幾乎是港人皆知，改變不了調委會的判斷。由此更加激起港人普遍要路辭職或撤職的聲音。

可是，在調委會報告公開之後，特首召開記者會，聲稱路祥安為人「誠實可靠」，完全適合繼續做其助理。他這樣的挺路而與調委會唱反調、相對抗，表現出他一直以來的任人唯親，堅持錯誤，而完全不尊重港大校委會委出的調委會。

特首高官自恃大權在握，可以不顧民意民情，獨斷孤行。他們的權力，還包括對各大學撥款資助的任意決定權，指示教育資助委員會去運行，用這種「分而治之」的手段，促使各大學當局為了爭取得政府更多的撥款，不惜進行自我審查、約束，迎合當權者的喜愛（這也是鄭耀宗拍馬奉承政府高層的動機之一）。

本來，特首和特區政府近年來的施政繼續失誤，引致民怨沸騰，聲望不斷下跌，是客觀存在的事實，

幾乎所有的民調結果都大致上反映出來。港府高層理應由此得到教訓，徹底改正自己的錯誤、過失，而不應怪責於學術研究及民調工作者，並要他們停止工作，有如一個人的醜貌被鏡子照出卻遷怒於鏡子，並要打爛它那樣！

但是，希望港府高官認識和坦承過去的錯失而加以改正，那等於緣木求魚。因此，新組成的立法會，完全有責任委出一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就鍾庭耀事件作深入調查，傳召一切有關人等出席應訊。這樣才能使真相大白，挖出干預港人各種自由的「禍根」，保障港人的自由權利不受到侵犯。

不過，由於第二屆立法會仍然會由保守的「保皇」黨派和個人佔了多數，他們勢將盡力反對成立這樣的委員會，去調查特首及其助理路祥安的干預學術自由角色。這是考驗人們在競選時口口聲聲「真誠為香港」、爭取民主自由的最好試金石，很快便會暴露出投機政客的廬山真面目，需要港人密切留意、共同要求及促使立法會成立這個委員會，以便有權力去查出真相，有助於防止任何對學術自由、民調工作的專橫干預！

2000年8月31日



■學者在討論鍾庭耀事件的論壇上，大爆香港學術自由早已受壓。

立法會舊瓶舊酒

振言

第二屆立法會已經組成了。它可曾給予人民大眾新的觀感和期望，又帶來什麼啓示嗎？

本質和作用不變

這一屆的組成比上一屆不同的祇在於把800人「選」出的10席減為6席，使分區直選的20席增加為24席，其餘功能組別的30席和原有的投票機制等，都維持不變。這就顯示，上一屆所存在的不平等、不合理等情況仍將保持下來：一小撮人享有3次投票權，而絕大多數選民則只有一次，踐踏了「法律上人人平等」的原則；極少數人「選」出的席位多過全港選民直選出的席位；立法會表決時須分組點票，兩組都佔多數票才能通過，造成一組中有9票成為多數反對，而支持的兩組合計雖有30多票，也不算通過，以致兩年來有9成以上由民主派議員提出而對民生、民主有利的提案，都遭到這種不合理投票機制的掣肘而被否決，確保了保守的「保皇」派、親京派的操縱權；同時，行政主導的原則造成行政長官及其行政會議的權力獨大；立法會應有的實權被剝奪，變成爲政治花瓶；即使一人一票直接選出部份立法會議員，在立法會內也難有多大作爲，不能根本改變現時的政治體制，和特首及其政府的施政失誤。以上的實況，也是多位第一屆議員宣佈不願再競選連任的原因之一。

在當年被批評爲民建聯「度身定造」的名單投票制，以及報名參選後不能撤換其中的候選人這條規定，使得程介南雖被揭發在上屆任期內以權謀私和沒有誠信證據確鑿之後，他依然可繼續競選，並得益於民建聯名單而當選，沒有受到應有懲罰而取消其參選資格。

前述的立法會功能和選舉規則，造成許多選民不願去投票，使第二屆直選的投票率比第一屆下降9.72%，實際投票人數少了近16萬人。此外，選民投入無效選票11,502張，比上屆增逾一倍，其中空白票8,483張，比上屆增加9成，有些廢票寫上「無恥、無能」、對政府不滿、「路祥安下台」、「揀無可揀」等字句。這些都顯示大量選民對政府、政治制度、選舉制度、候選人等的正當不滿，以空白票表示抗議。

民建聯的收穫

不管民建聯幾年來對政制、特首和特區政府的施政幾乎都採取支持的立場，發揮了「保皇」的政治作用，但在這次直選中，卻得票391,718票，比上屆只

減少7,615票，得票率爲30%，仍比上屆增加2.2%；所得席位11席，比上屆增加2席（其中包括原港進聯的蔡素玉和鄧兆棠兩席）。相對於民主黨，它的得票數減少不多，因而成了這屆直選的贏家。儘管它在選前備受程介南「以權謀私」醜聞的影響，一度出現了危機，幾乎所有選前民調結果和專家學者的預測，都顯示它的得票率和支持的選民人數會劇跌。這種危機感更加激發它動員所有能動員的人力、財力去爭取選票，它的人力、財力等優勢是遠遠超出其他競選對手的。其力量來源，一是中共（通過在港的中共黨員和中聯辦等機構的支持）；二是它的2千黨員，尤其是工聯會的20萬會員；三是與大陸有利益關係的工商業資產階級和在港的國有企業，發動它們的僱員支持，特別是給予大筆款項的支助；四是3份「愛國」日報的全力宣傳，和另兩份暢銷日報在選前大事抹黑民主派的幫助，等等。

正由於它擁有充足的財力人力，使它能夠運用來大做愛國思想教育和地區的工作，它常搞民調統計以提高知名度，又做街坊的福利工作，例如，舉辦國內旅遊、荔枝團、齋宴、蛇宴等，以「培養」坊眾對它的感情，從而預先控制了一部份選民的「鐵票」。許多國家一般都有規定，所有參選政黨或個人不准在競選時以金錢、禮物或宴客籠絡選民。民建聯早在競選前便以「小恩小惠」分贈未來的選民，所不同的主要是時間上的先後和贈送的類別吧了。

倘無重大事件（例如大陸爆發民運或革命，促使港人政治意識普遍大幅提高，或民建聯又發生遠爲重大的醜聞或錯失）所打斷，恐將是難以阻止民建聯發展的趨勢。即使是它的「四大天王」之一爆出了如此聳人聽聞的醜聞，也難以阻止它的選票大減，便可得到啓示。在一般的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經濟上佔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支助的政黨，由於擁有雄厚的財政資源，從而成爲最大黨以至執政黨。資產階級需要保守的「保皇」黨作爲協助它統治的工具。香港現時也是資本主義社會，所不同的是，在中國大陸執政的中共，非常需要民建聯成爲強大的政黨，以協助它貫徹執行它的方針政策，穩定香港的黨官商人聯合統治；而民建聯的領導層也將會緊跟中共，奉行中共指示的。

民主黨的受挫

與民建聯發展趨勢不同的，民主黨過去的優勢卻

受挫而響起警鐘了。這表現在這次地區直選中，民主黨得票462,423票，得票率為36.12%，比上屆跌了8%；所得席位12席，比上屆少了一席。這種下跌，部份原因是多份親中和傾向親中的港報在選前大力攻擊民主黨「侵吞6百萬公帑」（後來改稱「濫用公帑」）。同時被攻擊的，還有曾健成（阿牛）被指侵吞5萬元保釣捐款、前線劉慧卿遲了申報在瑞士的投資公司，等等。抹黑範圍還翻到多年前已澄清或解決了的事，例如，攻擊陳偉業因他的太太在94年經由僱傭公司誤用了一位華裔女臨時替工）。

許許多多的抹黑，使許多市民感到疑惑、迷惘甚至不滿，原本支持民主派的選民，不去投票或者改投空白票。可以看到，多份報章以抹黑民主派去反攻、轉移了和沖淡了對程介南醜聞的視線是收效的。

民主黨得票的減少，還有更深層的原因。它的政綱搖擺不清，不願明確地站在低下層普羅大眾的立場，反對訂定最低工資制，反而偏幫中產階級、中小企業主及專業人士；它的主流派與「少壯派」政治意見不和，加劇了分裂危機，導致近年有許多人退黨；劉千石又被以「雙重黨籍」「理由」趕走。加上其他的缺點錯誤，使得不少人對它不滿、失望、離心，因而在這次直選中不支持它。

部份又由於民主黨的人力財力遠遠不及民建聯和不夠重視地區工作，使它在這方面大大落後於民建聯，也是它得票減少的原因之一。

民主黨有必要從這次選舉中吸取經驗教訓，今後要轉變方向，真正地保衛低下層市民的利益，替他們出聲、爭取權益。近年來已時常有人提出這種需要。由於回歸以來低下階層處境的日益惡化，更加需要有政黨全力為他們的權益而奮鬥。

「長毛」參選的衝擊

在這次分區直選參選人中，也有些長期替低下層市民發言、爭取民生民主權益的街頭戰士，梁國雄（長毛）就是這樣的人之一。他的敢言、敢為、提出鮮明主張，尤為廣大市民所知曉。只有他在競選中提出要大陸「結束一黨專政」。港台一節目主持人公開宣稱，他具有托洛茨基派的思想。

他說，他這次參選，目的在於傳播其不同的聲音，讓更多的人民了解。我們對他的競選政綱〔編者按：請參閱本期的轉載〕是十分贊同、支持的。

雖然他在新界東這個選區未能當選（這與他非常缺乏競選所需的龐大財力、人力很有關係），但仍得到18,235票，得票率近6%，比獲選的民主黨黃成智少7,736票。而特別有意義的是：在這次選舉前幾天，由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中心、學友社分別進行的3萬

多和近3萬的中學生「模擬選舉」中，梁國雄都是以該分區的最高票當選，比正式選出的該區最高票當選議員劉慧卿還要高很多。學友社教育研究部主席鄧明基事後表示，由於梁國雄的平民形象突出，較能令中學生產生共鳴，所以得到高票數（9月11日《星島日報》）。而明愛中心負責這選舉的林強亦指出：「投票的中學生被『長毛』、『阿牛』為民請命的正義形象牽引下，認同了他們的處事與立場」（9月14日《香港經濟日報》）。至於小學生的看法，《星島日報》9月17日港聞版報道了民協助選團的3位小六學生的話：「長毛是英雄，真心為香港人。」

一些社會人士也提出了對他的看法：

香港城市大學政治學講座教授鄭宇碩認為：「梁國雄先生一貫關心香港。對香港問題，他有一套見解，我是非常尊敬的。」

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文思慧相信：「當（長毛）不再在這個社會上如此突出之日，正是我們的社會轉向比較合理之時……因為長毛做得到的，其實每個人都可做得到的。」

馮智活牧師（1991-1995立法局議員）則表示：「我支持梁國雄，因為他貫徹地支持基層市民及弱勢社群，不畏強權、不辭勞苦、不計較個人得失，並懷著高尚的理想，不斷為社會、為國家、為人民作出貢獻。」

此外，前學運領袖王丹也給他來信表示支持道：「從你的競選政綱可以看出，你走的是一條與低下階層群眾站在一起的民粹路線，從出發點到基本訴求，都與民眾利益息息相關，這對民主運動很有正面意味。」

以上所引對梁國雄的模擬投票結果和部份評價，可顯示出「長毛」的抗爭（競選也是其中一種方式）是得到廣泛認同的，並且替這次直選帶來了不同的衝擊。

現在，選舉已塵埃落定，當選的候任議員（除程介南之外）將開始他（她）們的4年任期工作。這4年，是考驗每個議員是否履行其競選政綱的時候。古今中外的歷史經驗顯示，無數的機會主義政客，在爭取選民支持時便作出許多的承諾，說當選後為選民辦到這樣那樣的事；但在上任後，卻把自己先前作出的諾言背棄了。香港市民必需監察每個議員今後的表現（包括在立法會會議上的發言、提議、投票取態等），檢驗他們是履行還是毀棄其競選政綱諾言；假如是後一種情況，便須起而加以揭批、迫其改正或者加以彈劾、撤換，而且在下一屆選舉時決不再投他以支持票。

2000年9月17日

過去，投票成為我們的慣性動作，
成為履行公民責任的例行公事，
我們有否考慮改變慣性投票行為？
選擇不同的聲音？
選擇反映我們心底訴求的代表？

長毛參選宣言

我代表「四五行動」參選，是要為長期受壓迫的基層市民及弱勢社群吶喊！

回歸3年，香港不單在民主及人權方面大倒退，更經歷金融風暴、經濟衰退、失業高企、貧富懸殊及民不聊生的困境。究其原因，是香港缺乏一個由市民選舉，因而不具問責性的社會，特區政府往往偏幫大商家，大財團的利益，使基層市民的生活日益困苦，如以2千億公帑救市而不救人，只為某財團牟利。

除此以外，特區政府更不斷向不同階層人士「開刀」：如削減綜援，阻止港人內地所生子女到港，削減社會服務開支，大搞公營服務私營化，帶頭裁員減薪。如今，香港社會日漸分化，少數人的得益，其實建立在絕大多數人的貧困上。

我深信要改革現存的不公平制度及社會問題，除修改基本法，爭取「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外，更要低下階層團結起來，推動改革。

我更認為，香港的未來建基於中國的前途，一日中國內地一黨專政不作改變，香港的民主及基層運動亦難以寸進。為中國民主呼籲，是我對民運的承擔！

為此，我毅然決定參與立法會選舉，因為我相信「我不喊，誰喊！我不罵，誰罵！」的道理。

我為甚麼參選？

我代表四五行動參選，是要為長期受剝削、欺壓的民眾吶喊！

打工仔女和勞苦大眾創造了社會財富，卻淪為被壓迫和被剝削的沉默大多數。80年代殖民地政府的泡沫經濟政策，造就了金融、地產財團發大財。97年泡沫爆破，引發了裁員減薪這個定時炸彈，低下階層生活日益困難。不過兩年，失業和就業不足人數由8萬飆升到數十萬。在職者亦飽受減薪煎熬，活在裁員的

恐怖陰影下。

特區政府不理民困，「救市不救人」，以2千億公帑入市，袒護財團；補貼所謂「高科技」財團牟利。無論股票市場的科技股炒作，抑或經濟轉型為高科技工業，絕大部份工人都未曾受惠，淪為賤價勞工，或被排拒於就業行列之外。政府除竭力維護財團利益外，更劫貧濟富，削減綜援，向公務員開刀，帶頭裁員減薪，倡議銷售稅。政府縮減社會服務和福利開支，令老弱傷殘、孤寡不幸的弱勢社群雪上加霜。醫療、教育、公屋服務質素日益下降。少數人的繁榮，其實建立在多數人貧困之上。

在目前的政制中，特首和行政會議是中共變相委任的，政府高官只向他們負責，不受民眾監察，淪為金權政治的橡皮圖章！要改變打工仔女的命運，就必須徹底革除專制！基本法從未經香港市民過問，只由一小撮達官貴人通過而強加於我們身上，因此必須由市民公決修改，使大眾在普羅民主制度的基礎上當家作主。

我們認為，要讓市民享受應有的社會、政治、經濟權力，使勞苦大眾不再受財團和政府的剝削壓榨，就要爭取一個由全港市民一人一票普選產生的代表大會，修訂基本法，普選立法會和政府，實現公義、平等來保障社會大眾的生活。要達到這個目的，就要低下階層組織起來，成為一個群眾運動。四五行動參選就是要為建立這個運動而努力。

香港是中國的領土，內地一黨專政一日不變，中共政府就會繼續夥同資本家壓榨我們，扼殺我們的權力。因此，支援內地同胞爭取民主自由，反對一黨專政，也是我們參選的重點。

如果你覺得這是你的心聲，就支持我們吧！

政綱略要

勞工權利

1. 設立失業援助金、最低工資和工時上限。
2. 恢復集體談判權、諮詢權及參加工會不受歧視和無理解僱等權利。
3. 工會有權參與制訂工業安全標準、設備和勞動條件。
4. 立法保障罷工權、訂立「不公平解僱」法。
5. 擴充職業培訓，在職受訓者可按原薪三分二支薪；失業人士可申請津貼再培訓。
6. 反對任何形式的歧視，爭取通過平等機會法（包括年齡、種族、性傾向、職業等），所有人同工同酬。
7. 重罰剋扣工人工資、將強積金供款轉嫁工人的僱主；強積金應由政府參與供款經營，保障工人權益。

經濟民生

1. 反對削減綜援、反對開徵銷售稅。
2. 開徵累進利得稅及資產增值稅，用以設立全面性社會保障制度；開發基層就業機會。
3. 由幼稚園至中學學費全免；凍結大專院校學費。
4. 反對政府將公共服務私營化，擴充社會服務和公共建設，如學校、醫院、社區中心、長者中心、託兒所、道路和環境保育，創造就業機會。
5. 所有公用服務如水電等均由政府經營，由民選機構監察，防止財團壟斷牟取暴利。
6. 立法限制金融、貨幣、股票炒賣，增加印花稅，設立中央銀行。

7. 加速興建公共屋村，改善建屋質素，讓每個有需求的市民均有機會入住。
8. 立即停止削減新公務員入職條件，堅決制止向低薪公務員裁員減薪。

政治民主

1. 一年內舉行全民公決，決定何時舉行全面普選政府和全權的立法會。
2. 由一人一票選舉的民意代表組成的制憲大會修改基本法。
3. 廢除基本法及現行法制中壓制市民權利的條文。
4. 廢除間接選舉及委任制。
5. 各級議會及由選舉產生的權力機構成員，可由原選民罷免。
6. 金管局、醫管局及房委會等重大決策機關由各級民選議會監督，議會並有權罷免各級決策機關要員。

全國施政

1. 實現言論、集會、結社、出版、示威、遊行、罷工的權利。
2. 全國人大經普選產生；代表可由選民罷免和撤換。
3. 結束一黨專政，實現黨派自由。
4. 獨立工會合法化；工人、農民有權組織自治機關。
5. 學術、思想自由；學生、教師有權組織自治會參與及管理校政。
6. 職工有權選出代表機構，以決定工廠企業的生產及經營方針，並有權監察、罷免公職人員。

為何要結束一黨專政??

絕對權力造成絕對腐敗。一黨專政就是中共壟斷一切權力，不單必然滋生貪污腐化，令人民創造的財富淪為一小撮官僚私產，導致貧富懸殊，人民貧困。而且，由於中共為保持特權而扼殺人民各種自由，更會窒息人民的創意和潛力，令社會停滯不前，發展舉步為艱！祖國如此，香港豈能避免官商勾結的金權政治？

**一個民主、法治、自由及人權的中國，
才可紓解國內人民的苦難，香港才有希望。**

中共十大違反人權事件簿

1. 實施死刑，大量處決商業及刑事罪犯
2. 在拘押囚犯期間，採取不合乎人道的酷刑
3. 拘禁政治良心犯及關押異見人士
4. 剝奪不同政見人士的回國權利
5. 打擊組黨結社及獨立工會運動
6. 剝奪集會、遊行及表達意見自由
7. 剝奪信仰及宗教自由
8. 控制出版、通訊及新聞自由
9. 壓制政治參與權利，拘禁議政、參政人士
10. 剝奪異見人士獲享公平審訊及抗議的權利

長毛的抗爭簡歷



70年代

- * 參與金禧復校及抗爭運動
- * 為油麻地艇戶爭取合理安置
- * 參與「中國民主運動資料中心」，成為本港首批支援國內民運分子之一

80年代

- * 參與「營救劉山青委員會工作」，前後十年為此事奔走
- * 組織「四五行動」，為中國及香港民主運動貢獻力量

90年代

- * 加入「支聯會」，成為常委，繼續為中國民主奮鬥
- * 參與兩年多的反對臨時立法會運動
- * 97後，眼見基層市民生活苦不堪言，成立「反失業、反貧窮聯盟」，為弱勢社群前赴後繼

梁國雄的過去、今日與未來

現年44歲的梁國雄「長毛」自70年代開始，已參與香港的民主及社會運動，由金禧及艇戶事件，至支持國內八九民運，保衛釣魚台運動、反對成立臨時立法會，要求恢復集體談判權，及「反失業，反貧窮」運動等等，在在都顯示「長毛」貫徹始終。一如既往地為自己的信念奮鬥到底。他曾說：「以前沒有人敢做的，我必定會義無反顧地努力幹……」，這可說是他最佳的寫照。

十大理由支持長毛

過去，投票成為我們的慣性動作，成為履行公民責任的例行公事，我們有否考慮改變慣性投票行為？選擇不同的聲音？

1. 因為香港需要不同的聲音

香港需要有不同的聲音，讓弱者不致窒息，使社會更健康地成長及發展。

2. 因為香港的制度不民主

特區政府成立至今，由於不民主的制度，市民的民主權利被受剝奪；是時候作出「自下而上」的改革。

3. 因為商人治港，金權政治

特區政府的施政往往偏幫大商家、大財團的利益，置普羅大眾於不顧，向不同階層人士「開刀」；是時候扭轉這「畸形」現象。

4. 因為香港「貧者愈貧、富者愈富」

過去香港被視為努力工作者的天堂，如今少數人的利益，竟建立在多數人的貧困上。要突破這不公平現象，是時候作制度上的改革。

5. 因為「長毛」代表草根階層

「長毛」出身自基層，深深體會低下階層市民生活的困苦，了解他們的需要，代表他們的心聲。

6. 因為「長毛」始終如一、貫徹始終

過去二十多年的奮鬥顯示：「長毛」從來一如既往為中國、為民主、為基層，以言、以行落實信念。

7. 因為「長毛」敢說、敢做、敢拼

「長毛」不單言行合一，更從不依附權貴，從不「轉軚」，從不「左右逢源」，只依據自己固有的信念行事。

8. 因為「長毛」願意為信念付出代價

「長毛」多年來為理想打拚，前後兩次因政治原因（非法集會及擾亂立法會）被判入獄，可見其身先士卒的精神。

9. 因為「長毛」的綱領合乎我們的需要

「長毛」提出的綱領，如全面社會保障、全民普選特首及立法會，以至結束一黨專政，合乎解決當前中國及香港的問題及需要。

10. 因為是時候作出改變……

答客問



問：現時香港立法會有那麼多限制，「長毛」可為大家做什麼呢？

答：現建制由於奉行行政主導，加上分組投票及提交私人法案的規限，立法會逐步淪為「橡皮圖章」，無甚作為。但是，「長毛」進入立法會，目的是突顯現制度的矛盾及荒謬，進而組織及發動市民，投身參與改革現建制的行列。

問：過去，「長毛」長髮披肩，學歷不高，如何能擔當稱職的立法會議員？

答：一位稱職的立法會議員，不在乎他外表的形象，而在於他能否反映大家切身的利益及意願。更重要的是，「長毛」多年來依靠自學，比許多手持多張文憑的有識之士，更深切體會民間疾苦，更願意為平等及公義打拼。俗語有云：「世事洞明皆道理，人情練達即文章」。

問：「長毛」言行激進，經常「搞搞震」，對社會有害無益，你有何回應？

答：在現今不民主及官商勾結的環境下，「公民抗命」是我義無反顧的抗爭選擇，目的是為建構一個民主及公義社會。如果為改變這不公平的社會，而被稱為激進是我的榮幸。

問：「長毛」多年來參與運動，是因收受外界的支助，這是否屬實？

答：「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這類抹黑的言論是完全缺乏事實根據。若大家不相信，我可以公開個人財政狀況供大家查閱。

董建華施政失誤事件簿

- 1 金融風暴期間，祇顧「救市不救人」，置市民於水深火熱；
- 2 特區施政只照顧「大商家、大財團」利益，如興建數碼港、暫停賣地等，對基層市民則毫無實質援助；
- 3 廢除保障勞工法例，其中包括：集體談判權及工人參與工會權等
- 4 不檢控胡仙，破壞法律公平、公正原則；
- 5 美其名「公務員制度改革」，實質是大搞「私營化」，帶頭裁員、減薪，打擊本地勞工市場，令市民加重負擔；
- 6 為削減財政開支，不顧弱勢社群死活，削減對老弱傷殘的綜援、強推醫療保險方案、社會服務一筆過撥款；
- 7 在民望不斷下跌的情況下，特首辦成員公然干預「民意調查」的進行及結果，打擊學術自由；
- 8 為求於回歸一週年新機場開幕，令機場出現大混亂，成為國際大笑話，經濟損失無數；
- 9 以人大釋法阻止港人內地子女到港，編織「一百六十七萬移民」的謊言，缺乏誠信，更剝奪港人家庭團聚的權利；
- 10 以「教育改革」為名，推出語文基準試、削減對大學生資助等，令教師士氣受損、加重低下層市民的教育負擔。

1. 唯有董建華下台才可建構負責任的政治文化；
2. 一年內舉行全民投票，落實修改基本法；
3. 立即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

特區政府違反勞工權益事件簿

1. 廢除三條保障法例，包括集體談判權、勞工參與工會權利等；
2. 否決實施最低工資；
3. 否決制訂工時上限；
4. 否決推行失業援助制度；
5. 否決設立中央公積金，等等。

台灣人民的決定必須受到尊重！

國民黨失去50年的台灣總統權位

巴勒特著 兆立譯

2000年3月19日的早晨，全世界聽到了一個值得注意的政治變動的消息——陳水扁這個民主進步黨（民進黨）台灣總統候選人，以將近40%的選票當選了。不管北京的威脅、華盛頓的不贊同，相對多數的選民選擇了主張他們的島國獨立的候選人。僅僅在再度競選台北市（台灣的首府）市長失敗了兩年之後，陳水扁（他的支持者稱他為「阿扁」）卻能夠利用當政的國民黨的分裂。大多數台灣本地人長期以來對大陸來的精英份子的忿恨，一般人對政府貪污腐敗的惱怒，再加上國民黨的分裂，就造成了陳的選舉勝利。

在競選期間，陳從民進黨的台獨政綱後撤，聲明只在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事攻擊之下，才會宣佈台灣獨立。沒有人真正相信，陳的當選意味著台灣將在不久的將來正式獨立。可是，它是對港、澳賴以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國兩制」的一個清楚的拒絕。它也是對公開表達支持「一個中國」（意指台灣與中國大陸的最終統一）的克林頓政府的一個隱約的斥責。克林頓之偏愛國民黨的正式候選人、副總統連戰，早就是一個公開的秘密。

諷刺的是，在競選運動中，國民黨先前的、作為亞洲狂熱反共冷戰戰士的角色，已大部份被忘掉了。在一個時代，當經濟而非軍事是太平洋邊緣諸國至關重要的事務、中國共產黨必定要走「資本主義道路」、中央情報局所支持的獨裁者大都失去了政權（最近例子是印尼的蘇哈托）的時候，國民黨為了迎合遠東的新政治現實，不得不改裝它自己了。它這樣做的同時，也替它自己準備了最終失敗的道路。

從大陸來的精英份子，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就統治台灣，直至蔣經國在1988年去世。在這次選舉中，他們的後裔很多都拒絕支持他們的黨的候選人，改而支持獨立候選人宋楚瑜。宋，也像陳一樣，批評瀰漫著整個台灣政治生活的行賄、受賄，雖然在其支持者中有許多台灣最腐敗的反動份子。

國民黨不但背負著一個不老實搞政治的記錄，而且支撐著一個死氣沉沉的候選人連戰。連曾被人描述為一位「好像一輩子都沒在街上搭過巴士或走過路的木頭人」。在這次選舉中，宋在陳之後佔第二位；連最可

憐，佔極差勁的第三位。

台灣與中國的微弱連繫

中國文明當然是十分古老的：它可能是仍在繼續存在的最古老的文明。但是，台灣與中國的聯結卻是相對地近代的事情。荷蘭航海商人於17世紀在台灣建立一個殖民地。中國大陸的移民接踵而來。中國的皇帝在1684年聲稱擁有該島。在下二個世紀中，中國人的人口增加到超過與菲律賓人有血緣關係的原住民的人數。然而，這時期的中國王朝，國力微弱，無法對一個相距一百哩的島嶼實施較嚴的控制。

事實上，太平洋邊緣是受到歐洲貿易公司的管制，特別是當帝國主義列強朝向瓜分世界的時候。這個事情發生在19世紀的下半葉。1895年中日戰爭之後，台灣就變成了日本帝國的一個屬地。在往後的半個世紀中，日本人對台灣的經濟、文化發生深刻的衝擊。日本的影響，不但可以在台灣的建築物上看到，而且一直到今天還可以在口語中聽到。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失敗以後，台灣被中華民國「光復」了。可是，當時的中華民國正處在蔣介石的腐敗國民黨政府與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軍之間的內戰中。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像蔣介石的統治下的政府那樣的中央政府，企圖將其意志強加給台灣人民。「光復」以後的兩年都不到，台灣的人民，雖然在種族上是中國人，卻不再能夠容忍中華民國的統治。1947年2月28日，國民黨軍警企圖逮捕一位以在台北街頭販賣香煙維生的貧困婦女。當一個人過來保衛她時，他們殺死了他，像最近在紐約市所發生的事件那樣。人民就起來抗議了。國民黨的省行政長官陳儀命令其軍警向手無寸鐵的台灣人民開火。軍警繼續狂暴地行動了數日，當其停止時，根據政府自己的承認，約有1萬8千人被殺害了。

但是根據人們的估計，死亡人數接近4萬人——在一個當時只有6百萬人口的島上。「二二八事件」到今天為止對台灣人民還具有特別的意義，就像「淚痕」事件對於俄克拉荷馬州的徹羅斯族印第安人，或者「迪埃·雅辛」事件對於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台灣本地人民既沒有寬恕、又沒有忘記53年前大陸人的軍警所做的

事情。

當然，大陸人民他們自己也在蔣介石及其腐敗的國民黨政府的統治下受苦、受難。還有，國民黨人根本沒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團結、動員中國人民來抵抗日本佔領軍。爲了要趕走日本人、收復失地，真正作戰的是人民解放軍，以及參加它的千千萬萬的中國農民。

這些在戰火中鍛煉起來的游擊戰戰士打敗了國民黨軍隊；蔣介石一夥人逃到台灣，於1949年12月8日在那裡自立爲一個政府。蔣介石頒佈了戒嚴令。1947年在大陸上（大部份以作弊的手法）選舉出來的國大，全套被搬到台灣。連屬於兩個反對黨的議員們也跑到台灣來裝飾門面，讓台灣的政府有個民主的表像；事實上，這兩個反對黨，一個被稱爲「唯唯諾諾」黨，另一個被稱爲「當然」黨。

民進黨的形成與國民黨對民主的讓步

一個新的反對黨運動開始在1970年代發展起來，特別是在1975年蔣介石去世、他的兒子蔣經國接位之後。這個新運動通常稱爲「黨外」。在黨外的活動份子中，有林義雄、呂秀蓮（目前的副總統當選人）及施明德，他們以後都成爲民進黨的創始人。施明德後來成爲民進黨主席，林義雄是現任主席。他們參與發起了一份月刊叫《福摩薩》〔Formosa的音譯〕（Formosa是台灣島1949年以前的葡萄牙名字），並且組織了爭取人權、民主的示威遊行。

1979年12月，在南部海港市高雄的一次示威遊行受到軍警的攻擊，挑起了暴力的回應。是月13日，呂秀蓮、施明德和陳菊在施明德及其美籍妻子艾琳達的家中被捕。他們被控以煽動叛亂罪。林義雄在施家樓下，即施與其妻、三個女兒及母親同住的公寓樓下被捕。其他人也在這一次大規模鎮壓黨外活動中。兩天之後，阿里戈被當時擔任政府新聞處主任的宋楚瑜下令驅逐出境，返回美國。

8位被告在軍事法庭受審；30位在民事法庭。陳水扁是軍事法庭被告的10位辯護律師之一；另一位律師團成員是民進黨現任高雄市市長謝長廷。

正當審判開始時，國民黨的特務闖入林義雄的公寓，用刀刺死了他的母親及孖生女。他的最大孩子受到重傷。具諷刺的是一一也許是有意圖的一一這個罪案發生在1980年2月28日。到今天爲止，沒有人因此案而受到處罰。（在一次相似的政治威嚇行動中，1984年11月一位撞了就跑的大卡車司機撞倒了陳水扁的妻子吳淑珍，使她成爲一位下身癱瘓者。）

民主進步黨於1986年12月成立；兩年後，蔣經國去世，副總統李登輝繼任爲總統。李登輝是台灣本地人，不是大陸省籍，而且他認識到，蔣介石的反攻大陸

的夢是不再可能了。美國已在1978年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蔣介石的「中華民國」斷交。況且在1960、1970年代，台灣已發展出一個有生氣的、以輸出爲主的經濟，而李登輝夠聰明的認識到，繼續與日本、西方貿易，是台灣的、在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變得非常富有銀行家、航運家和工業家的唯一希望。

在冷戰接近尾聲的年份，明顯的是，冷戰獨裁者沒有前途，因爲尼加拉瓜的索慕沙、伊朗國王、菲律賓的馬可斯，都相繼失去權位。甚至那個冷戰反共基地南非也正企圖組織有秩序的從種族隔離到黑人多數統治的過程。

1990年李登輝宣佈大赦政治犯。施明德被釋放，艾琳達也能回到台灣（他們在1995年離婚）。民進黨得到合法地位，於是在1992年台灣舉行了第一次自由選舉立法院委員。

在1990年代期間，民進黨繼續擴大，在議會中贏得許多席位（雖然尚不是多數）。陳水扁於1994年當選台北市市長，而民進黨則於1997年在全省20個縣市選舉中，贏得12個縣市長。

這些事實，只指向一個結論：只有憑藉軍事力量，台灣才能夠被認爲是中國的一省。在整個20世紀期間，台灣只被大陸政府統治了4年（1945-1949）。而從1949年到1988年，大陸流亡來台的精英份子對台灣的統治，對大多數台灣本地人而言，是野蠻的、壓制性的。台灣的經濟和政治生活已在獨立於中國的經濟、政治生活之外的情況下發展起來。事實上，除了法律地位以外，台灣在各方面已是一個獨立國家。唯一阻止台灣本地人多數宣佈正式獨立的，是恐懼大陸的武力攻台。

總統選舉——為什麼陳水扁能得勝

整個選舉運動中，民意測驗都顯示，選舉結果會很接近，誰勝則難以預測。局勢在3月間開始轉向有利於民進黨。艾琳達在3月19日傳送給我及其他美國朋友們的電子信中寫道：

「對台灣而言，這是一個極端重要、關鍵性的時刻，也是我幾乎不敢希望的時刻。現在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時間來寫這份報告，但是我至少是這個事情的一位外圍參與者。陳水扁的最後拿到總統位置發生得如此之快，選票數目在投票完畢後兩小時之內就出來了，那時，他只比20年前把我踢出台灣的大陸人政府新聞官、法西斯主義候選人宋楚瑜多得了2.5%（30萬張）選票。而陳水扁只以39.3%的選票當選。

大變化是3月5日開始發生的，在那一天，諾貝爾獎金得主、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出來公開演講，攻擊黑金政治（意指政府中的腐敗與幫派活動）。公開演講贊助人之一的《台灣新聞》指派我翻譯李遠哲的演講

詞。幾天之後，李遠哲站出來明確地支持阿扁。好幾位工業家也站出來了。局勢開始呈現曙光。國民黨請全島各地數以千計的人們吃飯，同時贈以紅包，但是效力很難預測——這種方法在過去時常奏效。

明顯的是，給陳水扁捷足先登的，是李登輝總統所培養的省長宋楚瑜，因為他倒戈反對台灣化的國民黨，要團結老的大陸人國民黨（再加上他自己的贊助人網絡）來與他們攤牌。宋楚瑜在一年前因為宣佈以獨立候選人參選而被國民黨開除黨籍。他的政策雖然是要與中國更接近（因為他是一個大陸省籍人），但是他卻將自己改裝為一位『新台灣人』，『熱愛台灣』。在選舉前的最後幾天，他責罵民進黨被國民黨所腐蝕——好像他自己是像百合那樣的潔白。這還是發生在有人揭露他做了以下事情後的幾個星期：他通過從國民黨競選基金所榨取的私人賬戶，給他兒子錢在加利福尼亞州購買五幢房子，雖然他把自己描述成像教堂老鼠那樣的窮，一個誠實的官僚。……

歡欣慶賀陳水扁當選的人群大約有2萬人。他當選前最後一次、在星期五晚上的集會，根據宣佈，約有20萬人，比其他候選人的多了很多。我有幸參加了宣佈他們得勝的記者招待會。我的許多20年前的同志都在那裡。現副總統當選人呂秀蓮和陳菊都是在1979年的鎮壓中在我家被捕的。……

海盜〔艾琳達現丈夫的綽號——作者註〕和我在半夜裡跑到國民黨中央黨部前去看宋楚瑜支持者的近於暴亂的抗議。這些人大都是感到被李登輝出賣的大陸人——雖然造成陳水扁勝利的是宋楚瑜的分裂。幸運的是，他們不認識我，所以告訴了我許多有趣的故事，例如國民黨在兩星期前就知道連戰不會贏的，所以賣了大部份黨產（即以極低價轉讓給私人），以免落入陳水扁或宋楚瑜之手。現在，過了24小時之後，宋楚瑜的人還在包圍那個地方，而他們又被聰明地站得遠遠的防暴警察包圍。對大陸省籍人而言，看見國民黨失敗真是一個震驚；而對我們而言，看見他們示威到這樣子，也是相當奇怪的。他們是不是想製造一場騷亂、讓中國有藉口干涉呢？不過，到現在為止，它只是一個比較緩和的場面，雖然它在這時卻成為政治地理的中心。

通常而言，沒有人似乎認為，有秩序移交政權會有問題，但是，我認為，我們不能指望得太早。美國已向中國發佈了相當強烈的聲明，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朱鎔基一定要了解，他對台灣的威嚇並沒有搞垮這位主張獨立的候選人（相對而言，因為陳水扁已斷然主張，除非中國發動攻擊，他決不會宣佈獨立。」

朱鎔基是在離選舉日不到一個星期作出威脅的。他含沙射影地指出，如果民進黨得勝，中國會武力攻台。在過去幾次選舉中，這種威脅的確起了嚇唬台灣人民的

作用；這一次，這個威脅卻不靈光了，因為它反而激怒許多選民將選票投給陳水扁和呂秀蓮。

政治腐敗也是這次台灣選舉中的一個大主題，使所有候選人都要保證清洗腐敗政治——這種競選諾言美國選民是聽得多了。陳水扁當台北市市長時企圖清洗腐敗，卻得罪了有錢有勢的人，以致1998年再選時失敗了。

實在說來，所有政黨、候選人都有髒事。民進黨主席林義雄曾經批評他自己黨內的機會主義。他寫道，「民進黨目前最嚴重的問題，不是怎樣拿到政權，而是怎樣保證它會一直遠離權力的誘惑，不會失去台灣人民對它的信任」。

資本家階級及工人們所面對的挑戰

台灣是一個小島，大約有2千2百萬人口，根據東亞的標準，不大——但是它的經濟勢力與它的大小遠不成比例。1950年代，它接受美援。今天，台灣是外援的贈與者。它的人均年收入約為1萬2千美元，比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均年收入大30倍。台灣以輸出為主的經濟，在1980年代後期、1990年代整個時期中，從服裝/紡織、孩童玩具業轉到重工業、高科技，而它在美國貿易夥伴國/地區的名單上，現居第七位。

當中國的官僚統治層領導了從中央計劃（但是官僚地錯誤管理的）經濟倒回資本主義經濟的時候，他們也鼓勵了外國的投資，而相當多的外國投資來自台灣的投資人。台灣連年的貿易順差已積累了大量資本——多到無法在這個小島作可獲利的投資。台灣對太平洋沿岸地區的經濟、政治的重要性與它的面積、人口及自然資源遠遠不相稱。

可是，造成這樣一個資本主義動力室的代價可不小呢！蔣家父子壓迫性的獨裁，讓台灣資本家們創造他們的工業「奇蹟」，而不必受到惱人的工會要求公平工資、安全而衛生的工作條件的困擾。如果北京的鄧小平後繼人已從二戰後的亞洲經驗中學到什麼東西，那就是資本主義和民主是互相矛盾、不是互相補助的。在「亞洲四小虎」（南韓、香港、台灣和新加坡）中，只有一個——即香港——有相對的自由，可是，它是作為不列顛王國屬地而成為一個自由社會的。今天，香港已被融合在「人民共和國」之中，它的民主權利的前途是很不確定的。

自從台灣的戒嚴令在1987年解除、反對黨在李登輝的政府之下得到合法化以來，一個自由的工會運動在台灣勞動陣線的領導下興起了。台灣由於具有亞洲大陸最低失業率（2.8%）及較高生活水平，所以階級矛盾一直沒有表面化。南韓工人所實行的戰鬥性罷工並沒有在台灣發生。

雖然民進黨綱要求政府保證工人有組織罷工的權利，並且進一步地要求工資應該根據生活指數的增加而增加，但是工人階級的問題還不是它的競選運動的一個中心部份。那局部地是由於經濟增長，這個增長連1990年代後半期亞洲經濟衰退也中止不了它。還有，因為一般人把馬克思主義與官僚化的、暴虐的中國共產黨連繫起來，社會主義觀念很難在台灣工人階級中爭取到聽眾，工人運動的激進一翼很難在台灣工人階級中生根。

環境的破壞

台灣工業化的另一個後果是生態的破壞。台北市的空氣污染是亞洲大陸最壞地方之一。艾琳達因為患有氣喘，所以不能夠在台北市區居住，而成為台灣綠黨的一位積極份子。在台灣綠黨與綠色福摩沙的一份聯合報告中，艾琳達和T.J.吳寫道：

「根據台灣的環保積極份子的資料，不顧後果的工業政策已給台灣帶來了一個不可控制的、巨大的災禍，一個無聲的、會大量毀滅將來的輩代的定時炸彈。好像是台灣可以從1960年代的日本水俣病悲劇中學到一些東西。

現在，氯化物生產廢料的生產者名單已經收集到了，大家發現，台灣有7個生產者在1970、1980年代用這個生產方法一共生產出約有13萬噸的氯化物。其中大約只有1萬噸有下落，其餘12萬噸不知所蹤。……目前沒有跡象顯示，台灣的環境保護局有意願和能力來處理這個台灣的快速而大都未受約束的工業發展的其他有毒副產品。……對非法的有毒廢料的生產者、運輸者和廢料處理地地主科以重罪的法律已經通過了，但是是否會實施，那就要看事實了。環保局還沒有負起教育老百姓要留意自己的健康、參加廢料的發現和處理的責任。實際上，台灣環保局最近幾年忙著做的工作，是擋開人民反對政府興築堤壩或者破壞沼澤地或者用水泥覆蓋海灘、水道的抗議。」

不管民進黨的意向如何，不管陳水扁的政府做些什麼，他的當選已經鼓舞了台灣本地人民，給島上所有為社會正義而奮鬥的人們一個新的信任感。

工會會員、環保份子及那些為台灣的政治獨立而努力的人們，將會以一種他們不但能夠克服威脅和壓迫、而且能夠像陳水扁、呂秀蓮在這次選舉中所顯示的最終爭到勝利的信心，加強他們的活動。而這正是使江澤民——克林頓——不安的事。

雖然克林頓在1992年（即僅在天安門大屠殺3年之後）批評當時的布殊總統不顧中國政府的極壞人權記錄仍與其保持親密關係，克林頓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並沒有與布殊的政策有什麼不同。克林頓和他的顧問們

都懂得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們所懂的事情；資本主義與民主在今日世界上、特別是在亞洲大陸上是相互矛盾的。大企業會賺更大的利潤，如果像新加坡的李光耀、1988年以前的台灣的蔣介石、蔣經國那樣的專制主義獨裁政府確保不會有工會或環保份子找他們的麻煩。

可以確信的是，工會、環保份子以及那些為民主權利、台灣獨立而奮鬥的人們，在這個時候，正在感到他們的帆上有風了。那陣風能夠從台灣海峽的這一邊吹到那一邊去；如果台灣的民主運動能夠從高雄暴動之後的鎮壓中恢復元氣，中國的民主運動也能夠從天安門中恢復元氣。

勞工應該支持台灣的自決

在美國這裡的——以及在其他國家的、特別是那些與太平洋沿岸地區有貿易關係的國家的一——勞工運動，一定要要求台灣人民的願望必須受到尊重。我們一定要克林頓政府拋棄它的「三不政策」，對北京的那種讓步必須馬上停止。我們也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那些走資派作出同樣的要求。正如我們要求中國政府改進人權和勞工條件，我們也應該要求大陸中國政府停止對台灣的威脅，讓台灣人民充分的自決。台灣的人民有權利在沒有槍指在他們頭上的情況下作出決定。

不幸的是，多年來，許多社會主義者不太了解台灣的情況，只把它看成為國民黨獨裁政府與真正受到美國威脅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一個衝突。認清以下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雙方都主張台灣與大陸統一——國民黨的綱領是收復大陸、推翻人民共和國和恢復資本主義制度；中共則要求台灣重新統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內。台灣本地人，雖然受到大陸精英份子的壓迫，和使該島工業化的國內、外投資人的剝削，但是對台灣海岸以外的人們而言，卻是難認識到的。他們爭取自決權的鬥爭，在任何時候都沒有對人民共和國構成威脅，當然也沒有在今天構成威脅。中共堅持主張台灣是被打敗了的國民黨在美國的支持下從中國搶去的，這個主張太常常被左派的人毫無異議地接受。事實已決定性地證明不是這樣子的。為了台灣的人民無條件地享有自由、決定他們自己的前途的權利，現在是社會主義運動成為保衛這個權利的最好戰士的時候了。社會主義的綱領就是台灣工人階級爭取它的權利的一個有力武器。全世界先進工人們的國際團結運動也會如是。

（摘譯自《勞工旗幟》2000年春季號）

市場經濟導致生產很不安全

張開

中國加緊推行市場經濟，由於生產的目的是追求盡可能多的「經濟效益」——利潤，企業主和管理層都只重視生產，漠視安全，導致勞動安全衛生的「形勢嚴峻」，造成各種重大惡果，迫使官方不得不公開承認其嚴重性，展開全國性安全生產大檢查，發出緊急通知要各地採取有效措施加強生產安全，遏制重大事故的發生。

生產不安全的驚人數字

國務院在今年8月7日發出的緊急通知指出：當前安全生產形勢相當嚴峻。入夏以來，同類重大、特大事故連續發生，如6月22日四川省合江縣發生特大沉船事故，死亡130人，武漢航空公司發生特大空難事故，死亡49人；6月30日，廣東省江門市煙花廠發生特大爆炸事故，死亡38人，重慶市墊江縣爆竹廠（私營企業）發生爆炸事故，死亡10人。這些事故給人民生命財產造成重大損失，在社會上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

它所舉出的事例只是該10日內發生的部分重大事故。多年以來，中國非礦山企業、礦山企業、道路交通、水上交通、火災、鐵路、民航等各類事故每年導致非正常死亡人數約10萬人，其中工礦企業職工因工死亡人數約為1.6萬人。我國原煤產量約佔全世界煤總產量的1/5，工傷死亡人數卻佔全世界煤礦的4/5。

據國家煤炭工業局初步測算，全國煤礦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事故每年約在70起左右，平均5天發生一起。1996年，我國當年產煤13.74億噸，死亡10,015人。而美國每年生產標準煤9.6億噸，死亡38人。1998年，中國產煤12.2億噸，工傷死亡7,377人，百萬噸死亡率達6.04人，是美國的200多倍。自「九五」以來，我國重大傷亡事故頻發的勢頭一直不減，據不完全統計，僅工礦企業發生1次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事故，從1996年至1999年上半年就一共發生352起，死亡6,759人。

職業危害 令人觸目驚心

據不完全統計，中國現有有毒有害工業企業38萬多家，特別是在一些新建企業，勞動環境惡劣。據衛生部對1,426家外商投資企業的調查，37.2%的企業生產過程中存在著職業危害，從事有毒有害作業的工人佔生產工人的34.7%。近幾年來全國新確診的職業病患者，每年都超過1萬宗。其中塵肺病位居首位，截至1998年底，全國累計塵肺患者已達55萬人，已死亡13萬人，尚存活患者42萬人，是全世界其它國家塵肺病人數的總和。新發生的塵肺病人繼續以每年1.5萬至2萬例的速度增長。

另據衛生部歷年衛生監督報表的不完全統計，全國每年各類急慢性職業中毒者達數千人，死亡數百人；1999年急性中毒人數比1998年增加了47%，中毒死亡人數增加68%，今年頭幾個月的中毒事故，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6%，中毒人數增加了50%，中毒死亡人數增加了68%。4至5月的中毒事故更呈上升趨勢。

就是以上這樣嚴重的狀況，現在的統計並未能完全反映出目前安全生產嚴峻形勢的真實情況，有相當數量的傷亡事故被瞞報、漏報、不報。職業病統計也令人難以置信，據統計，我國目前有1,600多萬接觸有毒有害作業的工人，每年應接受職業健康監護1,000萬人，而實際接受檢查的只有1/3，其餘2/3的應檢人群中仍存在相當數量的職業病患者，這裡還不包括那些職業危害嚴重的鄉鎮企業、私人小作坊和那些已經返鄉又被檢查出患有職業病的農民工。

衛生部副部長殷大奎分析說，職業衛生立法不健全，是職業危害加劇的主要原因。不少企業在引進國外新原材料、新加工技術過程中，各種職業危害也隨之而來。中小鄉鎮企業的無序發展，使原來主要集中在城市工業區的職業危害迅速向鄉鎮企業轉移。

衛生部90年代初的一項抽樣調查表明，由於鄉鎮企業領導衛生法律意識甚為淡漠，83%的鄉鎮企業存在不同程度的職業危害，近34%的鄉鎮工業企業生

產工人接觸塵毒等各種有害作業，職業病患率高達15.78%。

位於湖北十堰市的竹山縣毛塔鎮銀洞村的湖北銀礦，現有職工305人，採礦分廠接塵工人達241人，佔職工總數的93%。該礦投產近8年，從未開展過測塵和接塵工人塵肺病普查。最近，經十堰市衛生防疫站的監測，才發現該礦掘進工的粉塵濃度最高竟超過國家標準1,000倍。由於該礦接塵工人多為合同工、臨時工、輪換工等，工作一段時間後就離開該礦。工人在出礦後才發病，企業由此而逃避了所應承擔對職業病患者進行治療和承擔賠償的責任。（上述的逃避責任方法不只存在於該礦，而且是其他各種企業所採用的。）

同時，由於鄉鎮企業職工素質不高，相當一部份職業受害者也根本不知道應該如何保護自己，另一方面也缺乏職業衛生的常識。

此外，像部份政府部門領導忽視職業衛生工作、勞動衛生職業病防治經費短缺、專業防治人員流失等，也是職業危害日益嚴重的主要原因。

不顧工人生命的「設施」

新建企業漠視安全生產。鄉鎮企業特別是「三來一補」和私營的企業迅猛發展，其中許多都違反國家勞動保護法規，把生產車間、易燃品倉庫和職工宿舍、食堂置於同一建築物內，即所稱的「三合一」工廠。樓下的貨倉或工場一發生火警，樓上的工場和住宿的職工便難以走避，因此，「三合一」工廠就成了眾多高發火災中的「重災區」，死傷慘重。

其具體事例有：1993年11月19日，位於深圳大亞灣畔葵涌鎮的致麗玩具廠發生特大火災事故，83人葬身火海，40多人被燒傷；1994年6月16日，珠海市前山鎮裕新染織廠發生火災，次日清理火災現場時廠房突然倒塌，造成93人死亡，15人下落不明，48人重傷，輕傷108人；1996年1月1日凌晨，深圳市寶安區龍華鎮清湖村的勝立聖誕飾品有限公司一棟簡易工人宿舍發生火災，造成20人死亡，30人重傷，79人輕傷；1998年2月13日，廣州市新市鎮華潤化妝品廠發生火災，11人葬身火海；1999年6月12日深圳寶安區沙井鎮智茂電器有限公司一場火災，職工死亡16人，傷56人；10月9日廣州白雲區永發購銷綜合店一場火災，職工死亡15人；同月26日廣州增城石灘鎮

馬修村洪成皮具廠一場火災，死亡20人；3月28日，廣東惠來縣佳成打火機廠燒死17名工人，等等，均是出於以上同一的「三合一」設施的原因。

此外，更由於缺少消防設備、安全措施，許多煙花爆竹廠時常發生爆炸，傷亡也大，單是在99年11月中至今年3月11日，不到4個月，便發生6宗大爆炸，一共死77人，傷52人。

除了上述的火災重大事故之外，又由於缺少安全防護設施，加上高強度的疲勞作業，導致工人喪失生命的事例也常有發生。例如，5月19日的《陝西工人報》，就有這樣的大字標題：「白玉紙廠一女工被機器活活攪碎」，揭發出陝西周至縣這件駭人的慘事。該報記者在事發後趕到現場，見遇害女工葬身其中的池邊台階沒有欄杆，在現場未找到任何安全防護設施；死者的工作崗位原為4人一班，去年以來精減為1人當班，每班由8小時增至12小時；該廠其他的電工、機修工24小時吃住在車間，所有工人都高強度地疲勞工作。該廠原為國有企業，98年底租賃給一私企經營，工人們都指責私企主「把工人不當人。」

私營企業為降低生產成本，減少投資於先進機器設備，竟大量買入劣質不安全的廉價設備。例如，浙江樂清市柳市、虹橋兩個鎮的私營企業，由於安裝使用的劣質沖床，造成樂清市兩家醫院每天要再接合14名工人斷手斷指的紀錄，一年累計便有5,000個例之多。這是6月19日《羊城晚報》根據《南京日報》報道的。

早在這個報道之前，3月2日的《工人日報》已刊登了《走近「斷指之鄉」》的報道，談的是偏遠山區的萬竹鄉，它屬於浙江奉化市大堰鎮，1979年中國推行市場經濟改革後，當地也開始辦起小加工廠，用塑料壓機加工零件，家庭式小作坊有200多家。工人們未經培訓便派去操作，每天工作12小時，壓機又無保護裝置，以致軋斷手指的事故不斷發生，「有的說傷者有幾百人，有的說斷指可盛一籃子」，該報記者估計「這些說法可能有點誇張，但斷指者眾多卻是不爭的事實」。記者到專醫傷者的萬竹衛生院查問，醫生也說「這種事情太多了，講不清楚」。一條鄉是這樣，其他鄉村也可想而知。斷指後草草包扎，僱主一推了之，受傷者只好回家，終生傷殘，賠償無望，控告無門。資本主義這種最殘酷剝削的情況之一，竟

重現於今天自稱「社會主義」的中國！

將來，隨著私營、外資等企業在中國大陸的蓬勃發展，特別是中國加入世貿後發達國家將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國轉移，這些變化都將會削弱企業的安全監督保證體系、職工安全操作技能及安全教育；安全投入不足，使安全形勢進一步惡化。

很難得到法律應有保護

嚴重的傷亡事故每年使上萬名職工失去生命，數十萬名職工傷殘，也使國民經濟遭受重大損失。職業危害對職工生命與健康也造成極大的威脅，不少職工工作不久就喪失勞動能力，長期受到病魔摧殘；一些孕齡女職工造成終身不育不孕，給其家庭帶來痛苦和不幸；有的職業病患者因不忍病痛的折磨而自殺身亡。關於自殺問題，5月27日的《深圳特區報》指出，中國的自殺死亡率在各類傷害中最高（19.58/10萬），高於全世界人群自殺的死亡率（15.23/10萬），大約每年有42%的自殺死亡發生在中國人中。中國的自殺死亡者中，相信有許多是由於不堪工傷及職業毒害折磨痛苦而走上絕路的。

儘管政府制定、頒行了許多關於生產安全的法令規章，但大量的企業主及其管理人員，以至許多地方官員幹部，都普遍地有法不依，有章不循，執法不嚴，違法不究；或者利用法例中不健全的「灰色地帶」，「走法律罅」，以逃避應負的責任和賠償，把損害後果全由因工受傷害的職工承擔。3月13日的《工人日報》，就列舉了如下的工傷補償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1. 「生死合同」時有出現，企業拒絕工傷賠償。一些企業甚至與職工簽定「生死合同」，只發工資，工傷「概不負責」，傷殘死亡由職工自己承擔。
2. 為瞞報事故而故意不定工傷或「私了」工傷。有些企業瞞報事故有種種「理由」：怕處罰、怕丟先進、怕扣獎金……。
3. 以種種借口拒付、剋扣工傷待遇。有的企業將事故責任認定在職工一方，理由為職工違章，從而不給予相應的工傷待遇。
4. 大量招用農民工、臨時工，逃避因職業危害造成的惡果。大多企業苦髒累險工作由農民工、臨時工、季節工承擔，企業對這些職工不進行身體健康檢

查，不進行生產設施的改造治理，短期僱用後，就解除勞動關係使其返鄉或另謀職業。相當一部份勞動者在不知情、不懂法的情況下，安全與健康受到損害。

5. 一些企業拒絕或不願意參加工傷保險統籌。目前我國工傷保險統籌覆蓋面不大，進展也緩慢。其原因之一是部份企業不願意參加，有的以「效益不好，沒有錢」為由；有的認為參加統籌吃虧而拒絕參加；有的以自我管理來代替工傷保險統籌，等等。

很難得到醫療服務

市場經濟帶來的另一種不利於中國勞動人民（特別是傷病的工人）的，是現行醫藥衛生體制的重大缺點，使他們的醫療健康深受影響，很難得到醫療服務。據國務院體改辦宏觀司司長宋曉梧為文指出：

「近年來職工醫療保險制度的改革難以推進，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置後。同時，一些體制性、結構性的深層次矛盾日益暴露，阻礙了醫藥衛生事業的健康發展。存在的主要問題有：

醫療費用增長過快……。90年代初，平均每人次的診療費用是10元多錢，每人次住院費用是400多元，到1997年，這兩項分別提高到60多元和2,300多元，各增長了5倍和4倍多。1978年到1997年，全國職工醫療費用從27億元增長到773.7億元，增長28倍。特別是90年代中期以後……。

以藥養醫促使藥費過快增長。在醫療費增長過快中，藥費增長又特別突出。在醫院醫療費收入中，藥費收入的比重平均達到60%以上，少數中小醫院高達70%-80%，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只佔5%-20%，大部份發展中國家也只佔15%-40%。醫療費用增長過快給國家、企事業單位和職工都造成很大的壓力和負擔。

衛生資源配置和結構不合理。我國醫療資源約80%集中在城市，其中2/3又集中在大醫院，一些高精尖設備的數量已經接近或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在醫療服務層次和結構方面，衛生資源集中在二、三級醫院，基層衛生服務和農村的衛生資源嚴重不足……衛生資源的配置越來越不合理。

衛生資源利用效率不高。由於資源配置不合理，低水平重複建設，造成衛生資源利用率低，運行成本居高不下。加上醫療費用上漲過快，個人支付醫藥費

比例增加，社會對醫療服務的需求受到明顯抑制。」……

這就承認了：中國政府把絕大部份的醫療衛生財政資源集中於城市、尤其是其中的大醫院，而且大大地浪費了，從而異常沉重地增加了全國勞苦人民、特別是農村居民的醫療負擔，使他們得不到應有的醫療服務。這也是醫藥治療方面受追求市場經濟利潤影響而造成的惡果。

在市場經濟導致勞動群眾工傷日益急增、健康愈益遭受損害的時候，他們又遇上這樣昂貴的醫藥治療情況，即使部份的城市傷病者可能申報得到國家或企業的大部份資助，但他們自己也須付出一部份的費用，而現時的醫藥費用卻已比過去突飛猛增了。難怪宋曉梧在上引文章中說：「生病住院作為人民群眾日常生活中不可迴避的問題，也是城鎮居民最擔心的問題。」更何況在嚴重缺少國家財政資助醫藥費用的廣大農村，當地的傷病者所面臨的醫治困難極之巨大，就可想而知了。

工人要擺脫無權狀態

儘管中共中央、國務院鑒於有關問題的嚴重，不久前曾下令進行全國性的生產安全大檢查，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各地採取有效措施加強生產安全，遏制重大事故的發生，但正如過去的經驗所啓示的，各地方幹部和企業負責人將沿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做法，表面上應付，實則「走過場」，敷衍塞責，即使一時收緊，但風頭火勢一過，便又放鬆如前。只要市場經濟追求利潤這個主要根源存在，同時工人又處於無權狀態，則企業主或管理人為了得到最大限度的剩餘價值，盡量節省對安全設備等的投入，盡量拼設備、拼勞力，因而對勞動者的生產安全漠不關心，不放在優先地位去設法和防範。

正如工人階級的解放要靠工人階級自己去做一樣，工人在生產中的安全，也要靠工人自己去干預企業的安全衛生設施、操作方法和時間，等等。為了有效地過問、干預廠務，工人應該有權管理生產，成為工廠企業的領導者和主人翁。在新中國建立以後一段長時期，中共為了利用工人階級對抗國內外的階級敵人，進行經濟建設，曾高調宣傳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從生產管理到國家大事都是「當家作主」的，儘

管實際上遠非如此，但工人階級的社會地位仍比其他階級「吃香」。可是，在改革開放後，中共對工人階級的上述宣傳卻逐漸音沉響絕，在官方報刊上已再難見到。隨著企業享有「自主權」的落實，工人對企業生產便極少影響力，即使是各級工會也沒有過問企業的權力。《工人日報》記者王偉指出：「無論是《工會法》，還是《勞動法》，對工會代表職工維護其在生產過程中的合法權益所賦予的權利皆大而空。看似工會處處有權利，實際只有建議權。……當出現危及職工生命安全的緊急情況時，有關法律僅賦予工會建議行政採取措施的權利，而無權帶領職工撤離危險現場。」「法律對工會在安全生產中履行監督職能權利的『軟化』，使得一些企業更加有恃無恐。這不能不說是近幾年安全生產形勢嚴峻的一大原因。」

企業惡劣的勞動條件，嚴重的侵權行為，往往導致勞動關係激化，並激起工人的抗爭。1997年，福建晉江市陳埭鎮裕華製鞋廠發生的特大火災，就是工人不滿惡劣的勞動條件、長期加班加點、老闆又長時間拖欠工人工資、矛盾激化後工人報復縱火造成的。

不過，個別地用縱火來抗議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唯有廣大工人團結、行動起來，發揮出自己的偉大力量，才能迫使企業和當局改變現行的政策、措施，維護工人的權利，保障工人在生產中的安全、健康！

2000年8月20日



(來論)

官賊論

王克江

賊有兩種，一種是民賊，一種是官賊。民賊者，無非是殺人放火，掠奪財物，爲害不可謂不深。但與官賊比將起來，實在是小巫見大巫，不值一提。官賊是一切腐敗官員當之無愧的稱號。

官賊的分類

我姑且把官賊分爲以下三類：

一、土匪類。這類官賊爲數眾多，但檔次較低，手段也不高明，大多是基層的官吏所爲。例：1998年12月18日，湖南省常寧市官嶺鎮書記鄧先君、鎮長曹英健、觀音村支書羅運星帶領「突擊人員」100多人乘三輛中巴、一輛小車，佩帶電棒、鐵棍、木棍等兇器到觀音村徵收上交款。村民尹成元、陳桂生、滕石連、滕文祥等村民拿出常寧市農民負擔管理辦公室批文與之說理。但遭到「突擊隊員」毒打。先打倒尹成元，再把陳桂生、滕石連等四人抓到派出所關押。接著100多人分批到各組收款。其中到陳桂生家破門而入，搶走稻谷、食油、電視機、錄音機、自行車，運回鎮政府。在滕文祥家，女主人歐元秀不在，就衝門砸鎖。滕文祥16歲的女兒滕美瓊以身護門，但遭到毒打。歐元秀趕回家卻兩母女一同遭到毒打；滕文祥趕回也遭打。滕文祥之侄滕國平見狀說了一聲「你們不要打人啊」，即遭毒打。國平回擊一下，卻被數十人用電棒、木棍、拳腳打得昏死過去。官賊以爲出了人命，便溜之大吉。後來卻反而判處滕國平有期徒刑一年，並分別賠償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歐青山、周青桂經濟損失4300.8元和3554.9元。（見《新世紀》1999年第12期）。從這件事不難看出，鎮委書記鄧先君等人真是十足的土匪流氓行徑，其實即使是土匪也未必比得上他們殘忍。這類官賊多如牛毛，幾乎每一個鄉鎮都有，每到徵糧的時候，鎮委和鎮政府就會組織大規模的突擊隊四面出擊，攻城掠地，無惡不作，搞得人心惶惶。

二、黑社會類。這類人在某些場合大講如何建設精神文明和反腐倡廉，但在另一些場合卻吃喝嫖賭、

拉幫結派，並與地方黑幫勢力相勾結、互相利用，無惡不作、魚肉百姓、殺人放火，比黑社會還要黑。例：原廣東陽春市副市長僱職業殺手謀殺市長一案。原平頂山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李長河僱兇刺殺呂淨一造成一死一重傷一案。（《法制日報》2000年3月18日報道）。廣西區隆安縣副縣長李紹武和原鄉鎮企業局副局長黃仲原，花重金（高達35萬人民幣）僱兇殺人一案。（《廣州日報》2000年4月13日報道）。這類官賊動不動就殺人滅口，其心之狠連黑社會分子也自嘆不如啊。但這樣已經敗壞到了連人樣都沒有了人，卻也照樣當官，可見現在政治之腐敗不知到了何種程度。

三、「君子類」。這類人是官賊之最高境界，平時深藏不露，和藹可親，實則肚子裡滿肚壞水，可劫人錢財於無形。小指頭一動，橫財滾滾而來；這類人還特別好色。原人大副委員長長成克傑是這類官賊的「傑出代表」，他每題一個字就有一萬元進帳，更不用說其他方面的收入了。原江西省副省長胡長清也不賴，經他手題寫的南昌市街頭數百副招牌不知爲他帶來了多少財富。當然，對於「君子」來說，題詞收入只是小兒科，大多數的「君子」並不題詞，但也一樣動不動輕易的擁有上億資產。這錢從那裡來？當然是用手中的權換回來的。這些「君子」是絕不會珍惜老百姓的血汗錢的，只要他們願意，大把大把的銀子任他們花。

官賊猖狂的原因

官賊目前之所以大行其道，流毒社會，禍國殃民，實在是有深刻的歷史原因和社會背景的，其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共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造成的。在專制的制度下，官員的行爲沒有得到民眾有效的監督，爲個人利益，官員與官員之間已結成互爲利用的合作伙伴，狼狽爲奸，你辦事我幫忙，我辦事你幫忙。這種關係是靠利益來維持的，都在一起剝削老百姓的同一條船上，官員與官員之間有著共同的利益，如果有一

個人出了事，他的同伙往往會不惜花很大的代價保護他，因為如果不保住的話將會牽涉到自己。由此可見，官官相護是根深蒂固的。如果中共不放棄一黨專政，官賊就永遠也治不了。現在民眾的耐心正一點一點的失去，當民眾完全失去耐心的時候，就是中共喪失政權的日子，到時將悔之晚矣。其次，近年來，我國的經濟發展較快，有很多人暴富起來，產生了為數不少的千萬富翁、億萬富翁，這些富翁奢侈的生活方式使幾乎所有的官員心裡感到了強烈的不平衡，在心裡不平衡之餘更是嚮往極了，扭曲的靈魂將會促使他們不顧一切的、想方設法去弄更多的錢。這個原因是很重要的，這從現在官賊的數量比改革開放前更專制的政治環境但經濟較落后時還要多可以看出。再次，文化的商業化與道德的沒落也是官賊猖狂的重要原因。中國的文化源遠流長，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文化之一。但近代卻一直在衰落，這主要是我們中國人自己造成的，從本世紀初共產黨的「以俄為師」到現在某些人的「全盤西化」，無一不在詆毀和弱化我們自己的文化。現代商業的活動亦使我們的文化嚴重扭曲。現在的西方社會還可以依靠宗教的力量來維持社會的道德，但我們卻什麼也沒有。

沉重的思考

官賊為害社會之巨，範圍分佈之廣，實在是民賊不能比擬的，民眾對官賊的懼怕遠遠超出了人們的想像。廣東省湛江市遂溪縣沙古鎮勝利村在今年3月底至6月初的兩個多月裡幾乎天天遭到沙古鎮管蘭隊（鎮政府組織的專門管理當地蠶繭市場的隊伍）的搶掠襲擾，先後被抓走關押的村民達60多人，大量房屋遭到破壞，大批財物遭到搶劫，直接經濟損失達100多萬元。該村在校學生290人因此短期失學；逃難群眾多達600多人，許多群眾夜宿桑林；20多名村民仍被拘禁；有二人受驚嚇過度，精神失常；一人服農藥自殺死亡。（《廣州日報》2000年6月6日報道）。在這裡還需要說明的是，這不是個別現象，而是普遍存在的。古人曾云：苛政猛於虎也。事實如此，官賊所竊走的不僅僅是老百姓的錢，更是竊走了老百姓對國家的希望，甚至將會竊走整個國家。善良的人們啊，當官賊肆無忌憚的欺壓我們時，難道我們僅僅會忍讓和逃跑嗎？或者等待官賊良心發現而放過我們嗎？難道我們更不應該聯合起來共同對付這些敗類嗎？

（2000年6月16日）

中俄新關係及與帝國主義間的關係

阿舍卡爾

〔阿舍卡爾任教於法國巴黎第八大學和巴黎美國大學，由他編輯的《曼德爾的遺產》最近面世。本文原載於希臘左派月刊《宣言》2000年6月創刊號〕

問：批評「北約」向東面擴張的論者認為，這將會助長俄羅斯與中國的合作。但贊成這種擴張的論者則強調，有必要保護東歐以防備俄國帝國主義的野心。你在這個題目上的立場是什麼？

答：我堅決同意前一種觀點。關於中俄交好這個問題，已經不再是對未來的猜度。俄羅斯現在已經成為

了中國指定的先進軍事物資（飛機、潛艇、驅逐艦等）的供應商。

俄羅斯現在向北京提供的那類武器，在蘇聯時代，蘇聯向其最信得過的盟友也是拒絕提供的。這並非僅僅涉及俄羅斯的經濟利益的問題。俄羅斯伴隨著碳氫化合物的武器是世界市場上唯一的一類即時溶解產品。

很清楚的是，一個國家被指定當高科技武器的供應商，比售賣流動電話所能創造的戰略性的聯繫，是遠要意義重大得多。而這種聯繫，是由中俄兩國愈趨鮮明的政治合流為基礎而得到鞏固。莫斯科和北京共

同譴責美國為「霸權主義」，譴責「單極世界」的誘惑。莫斯科和北京兩相支持（在車臣、台灣問題，等等），都是與國家特權有勾結，都被華盛頓評價為一若米洛塞維奇治下的南斯拉夫，或伊朗等國家，同屬危險人物治國。西方的政策，在實際上仍然是圍堵俄羅斯和中國，所以兩國有這種結果也是正常不過的。

就所謂俄羅斯的帝國野心的論句，我有兩點可說：第一，這種論句顯然是自圓其說的，因為俄羅斯愈是感到受威脅，她當然便愈是傾向於把本國傳統上的帝國邊疆收緊。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來說，俄羅斯對車臣之戰，是科索沃戰事造成的結果！

另一方面，那些反對俄羅斯的帝國野心的人，難道是出於高貴的情操和人道主義精神嗎？只有單純的人才相信這種廢話。俄羅斯的帝國野心就和他們其他人一樣不多不少，都是互相引動，都同樣應該被責難。

問：我們應該一視同仁的反對他們之間互相衝突的帝國野心，還是利用他們之間的矛盾，支持弱勢的一方以對付強者？

答：這便相當於支持中俄之反對「北約」，也就是人所共知的把敵人分為主要敵人和次等敵人的著名論調。這種論調尤其有害。

向其中一個陣營認同，認為它的目的有理，並且支持它追求不合理的目標以反對另一個強權的不合理目的，這是徹底的錯誤。唯有認同兩個陣營裡的受害者，以至伊拉克人和塞爾維亞人、車臣人和西藏人（是人民而不是政府），才是構成一個反對所有世界霸權的、貫徹始終的政策的基础。有必要反對各種各樣的帝國野心，保衛國際法的進步原則：人民自決權、各國主權平等、禁止使用武力違反國際法，等等。

而要鼓吹這些原則，便有必要保衛在全世界解除軍備、消弭緊張的政策。就是在這個框架裡而有需要反對「北約」向東部擴張，並且還要求「北約」解散。由於「北約」現在再次從一個防衛性的聯盟變為干預性的組織，所以更須要要求「北約」解散。

然而，在今天，威脅世界和平的最主要政策是來自美國，這是實情，所以我們是以此為根據，把她列作主要的針對目標；但美國不應該是全世界的和平運

動的唯一的目標。

問：歐盟現在已把創立一支歐洲軍隊放上議程。你認為歐洲現在是否已準備好「解除自己」於美國的軍事桎梏？美國在這個題目上有什麼態度？

答：我們首先應該把事情安放在恰如其份的規模，在赫爾辛基的歐盟高峰會議，決定在60天裡設立一支有6萬人的駐軍，並且為期1年，換言之，便意味在1年裡，輪班替換的動員人數是多過6萬名兵士。

這點當然不可忽視，但卻也談不上是一支「歐洲軍」，不能假設它有空襲的能力。這個規模只是夠用作「維持和平部隊」的佈防，就像前駐扎在科索沃的那樣。

而正是科索沃的經驗，促使赫爾辛基會議作出這項決定；因為當美國國內要求美軍撤出科索沃的壓力高漲的時刻，「北約」的歐洲成員無法提供他們所擔起的承諾。

這正是美國一再要求歐洲加強干預力量的原因。波斯尼亞的全部經驗，在在顯示出，當美國干預在本國國會內備受到敵對派別的堵截時，歐洲的無能所造成的嚴重後果會是怎樣。

所以，華盛頓要求她在歐洲的夥伴提高軍費開支，加強自主干預的能力，不過，華盛頓眼中的自主能力，當然是要把歐洲規限在「北約」的框架之內，把歐洲作為「北約」內的「歐洲棟樑」，作為美國的同盟，在美國的召喚下才作的干預。

而正是在這一點上使華盛頓與某些歐洲首府有著緊張的關係。例如巴黎，她尤其希望能有獨立的政治決策，以與技術上的自主相輔相承，因此歐盟能在毋須華盛頓的示意下獨立地作出某些干預的決定。

但事成為期尚遠。歐洲軍隊若要在「北約」框架下的美國的基礎結構裡異軍突出，還需要有許多必備的條件。再者，產生歐洲軍力的主催者是英國首相貝理雅；而人們勢難相信，他會意欲從美國的軍事桎梏中「解放」出來。

那些相信鼓吹加強歐洲軍力以對抗美國霸權的人，只不過是會鞏固西方的全球力量，對其餘世界不利。

（史丹譯自《國際觀點》2000年7-8月號）

資本主義殺人累累

——從多佛港中國偷渡移民的悲劇談起

《階級鬥爭》

58名中國移民在多佛港的一輛貨車裡窒息致死，令許多人震驚不已。這宗事件殘酷地顯示了移民的淒涼景況。移民在本國的處境絕望，因此挺而走險，不惜經歷慘無人道的偷渡條件，冒著生命威脅，只為了避過過關的移民管制，追求他們以為在英國能有的較佳的生活。

多佛港的悲劇的震撼之大，使到那些渣滓小報也放下一向把「非法」移民當作代罪羔羊的謾罵，改而對偷運人口的販子進行攻擊，指他們不應把那58名中國移民從比利時偷運出口。只不過，在這種道德責難的背後，其實仍然是把矛頭指向那些因「貪婪」而來英國「撈油水」的「外國人」，指他們把英國人民的資源吃掉。它們的論調仍然是那老一套的仇外情緒，只不過這次是披上了道貌岸然的外衣罷了。

英國和歐陸政府排外

英國工黨政府及它在歐洲大陸的同道中人所採取的路線，實與傳播媒體大同小異。英國首相貝理雅及歐洲其他國家元首，在葡萄牙舉行的歐盟高峰會議的講壇上，為多佛悲劇的死者洒下偽善的鱷魚淚，之後，他們便立即呼籲加緊對全歐洲的邊關管制，加強對偷運人口的販子的鎮壓。而由於往往不易在偷運者的行動過程中把他們捉拿，所以上述呼籲實際上就等如是加強對「非法」入境者的鎮壓。

歐洲政府向偷運人口的販子發動戰爭的宣言，是一場犬儒主義的鬧劇。要是沒有這些富裕政府的壓迫性的移民法律，這幫偷運人口的販子還能夠存在嗎？像那58名多佛港的死者，還會冒生命之險把自己生命交給那批惡棍嗎？事實是富裕國家的壓迫性的移民法律令偷運人口的行業得以肥大。據國際勞工組織的數字，這行業的營業額高達每年度3-4億英鎊，這宗金錢全部都是由來自貧國的人民支付！

在這個意義上，西方政府之手，是和它們所譴責的多佛港的偷運人口的販子的雙手一樣，都是血淋淋的。尤有甚者，西方政府每次加緊移民管制，皆是在

它們向選民鼓吹仇外情緒，企圖挑起選民間的仇外意識而實行的。

這些政府宣稱，加緊移民管制會防止多佛港悲劇的事件再發生，會增加對「非法」入境者的保護云云，這實在是偽善的假大空話。統計數字說明，實際情形是正好相反。在經過20年來一再加緊移民管制之後，不僅試圖非法入境的人不斷增加，而且冒著生命危險付費給偷運人口販子以進行偷渡的人也是不斷增加。

西方政府道貌岸然的虛偽性，尤其表現在它們對本國內部剝削這些現代奴隸以自肥的資本家所採取的不聞不問，不作一事。譬如在英國本土的二手市場，向來都是依賴於來自亞洲及近期依賴於來自土耳其的「非法」移民，這方面早已是聲名狼藉。又如在建築業，是廣為僱用來自東歐的「非法」移民，在飲食業裡則是中國移民。但在這些血汗工場裡，又有多少個僱員被判刑以至有多少個僱主被起訴呢？這些僱主不僅破壞移民法，況且也破壞保健、工作安全及國民保障制度各方面的規例。

但是對於英國的部長們來說，把「非法」移民強行遣返是一回事，而要向老闆剝削工人的權利來挑戰卻是另一碼子的事了。

移民潮的成因

西方政府時常吹噓它們在限制移民潮方面的成就。但在現實裡，它們對行之已久且愈演愈烈的移民現象卻是束手無策。西方政府的壓迫性的措施，只是能夠把移民潮壓往地下發展，僅是在門面上看不到暗裡的潛流而已。

對於許多移民來說，他們亦唯有非如此冒險不可；對於他們，離國到英國或任何歐洲國家居住，實在不是一個輕易的選擇。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是為了本人或留國親人的基本生存。他們全部都是出於一系列互為有關的因素而被推上前往富國之路：大部分第三世界國家在過去多年來陷入了一再惡化的貧困境地，

戰火連年，獨裁者或軍閥的兇殘統治，等等。所有這些因素，都是由富國政府通過經濟、政治、並且往往是軍事手段所維持的資本主義世界秩序所直接或間接造成的後果。資本主義在這個星球上的巧取豪奪而造成這許多地區的赤貧，而又是這種赤貧反過來造就了在窮國裡的大部分的地方衝突，為這些衝突造就了軍隊。而最後，更通常的是由於帝國主義間的爭奪而使貧國裡的衝突火上加油。

不過，向富國奔流的移民潮不僅來自於遙遠的第三世界。自從10年前開始，歐洲也產生來自本土的難民大軍。

這首先是從東歐的倒台和蘇聯的崩潰而開始。原先在整個東歐集團間進行勞力的國際性分工為基礎的經濟體系，滑落到亂局裡。在7年之間，即從1988至1995年，每日維生費用不超過4美元的人口從4%躍升到32%。從而便開始了來自波蘭、羅馬尼亞、俄國及其他東歐國家的「非法」移民潮；這些人在西歐國家的建築地盤業內尋找工作。至於工程師和其他專業人士，則前往美國、加拿大和澳洲尋求更佳的事業前景。

但這僅僅是個開始而已。在南斯拉夫，你爭我奪的政治，又再重新逐鹿鐵托的寶座，再度挑起舊有的民族緊張。這些政客得到了西方強權的青睞。而在西方大國看來，南斯拉夫聯邦的四分五裂，正是大好的機會，以便把一個能夠相當地抗衡帝國主義奴役的強大國家從地圖上一筆勾銷，並從而擴大西方影響的幅度。南斯拉夫最終是朝內爆破了，而且還有兩場延綿十載的血腥戰爭。

結果是眾所周知的了。南斯拉夫的狀況與非洲最惡劣的衝突大可比擬，而且幅度更大，整個市鎮、整個村莊的人民，在槍桿子下被迫流離失所；他們蒙受恐怖主義的手段，或乾脆被縱火焚毀家園而被逐離本鄉。在南斯拉夫內戰的第一階段，戰火從克羅地亞廣及波斯尼亞，產生了350萬難民；這些難民或是在本國內到處遷移，或是流往國外。在戰爭的第三階段，在科索沃，由塞爾維亞民兵和「北約」的轟炸，又製造了150萬名人民喪失家園。與此同時，在塞爾維亞，有10萬人前往西方找尋護身之所。

由戰爭造成的物質破壞，把前南斯拉夫的大部分範圍推回到上百年前的局面，令大部分人民貧苦無告。還不過在10年前仍然是個半工業國的國家，現在比許多第三世界國家都不如，所以使很多人除了離開

國家到別處尋找較佳的生活之外，別無其他選擇。

歐洲圍城

歐洲聯盟從1985年開始，在它們的國界範圍樹起了名為「神根區」的無形圍牆。從表面來看，新制度相當自由開放，因為任何一個非歐洲公民「只要」取得「神根區」內的任何一國的簽證，就能在「神根區」各國內通行無阻。只不過，設立這項制度之時，卻也同時收緊對旅遊入境證和居留簽證的簽發，而這又由各國警察使用高科技的電腦資料來加強，所以實際上是製造了更加嚴密的邊關管制。

而即使這樣，前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及現行的貝理雅，皆選擇廁身在「神根區」之外。這個做法，一方面是為了討好保守黨的反歐洲派的選民，另一方面，也是為了保留英國國家對入境者的選擇權，以便能採納某些第三世界的人士而排斥其他。

而結果，隨著申請政治庇護的人日漸增加，「神根區」是一再收緊入境管制。歐洲政府在1991年達成協議，訂立了一張所謂「安全」國家的名單；來自這些「安全」國家的尋求政治庇護者，將毋須經過審理而立即被遣送回原地。從那時開始，便在包括東歐和南歐國家的歐洲國家的範圍裡，訂立了一個緩衝地帶。

過了數年，在1998年，有2千名庫爾德族難民乘坐小艇在意大利的海岸線登陸。這件事令歐洲再一次收緊大門。這一次，歐盟政府向土耳其提供金錢和技術協助，以讓土耳其加緊本身的邊防控制，並且為「非法」移民設立拘留中心。土耳其向來就是來自中東和亞細亞移民的轉口站。此外，歐盟也向波蘭和捷克共和國等國提供同樣的協助。

在「神根區」的外圍，同時亦設立了監視線。這監視線在德國與波蘭的邊界尤其嚴密，彷彿鐵幕國的歷史重現，只不過這一次是方向對調而已。而從德國與波蘭邊關，一直延伸到西班牙的南海岸線，直達直布羅陀海峽。在這個海峽，本來用來監視海底潛艇的高科技系統，現在被用來監視從摩洛哥開來的載有移民的船隻。

繼此後，歐洲政府還實行了其他方案。其中之一，是把第三世界政府扯進其中，運用撤回歐洲援助的威脅，強使第三世界政府採取必要的步驟，嚴防潛在的「非法」移民離境。而這一點，其實是從英國帝國主義方面學來的。英國對其下的許多英聯邦國家已

經施用這套方法經年，使許多可能留境者不能進入英國旅遊。

所以，歐洲是一磚一瓦的砌起了圍牆；英國是在這堵圍牆之外，但它們的調調兒是不相伯仲。富裕的歐洲國家，把它們國家的資產階級向全球散佈的貧窮和絕望堵截，自我圍封起來。

資本才是外來者

可是，無論有多麼嚴的鎮壓和監視，皆無法把歐洲國家密封起來。上述所有手段，只不過使移民的風險更大，費用更加高昂，使偷運人口的販子的利潤更大而已。

問題的根源，是在於資本主義制度在全世界範圍內造成的不平等正在與時俱長。富國愈富，則貧國愈貧。這種狀況一天持續下去，則人們還是會冒著生命危險，企圖在富國找得安身之所，以便尋得較好的生活，或乾脆只是與免死於飢餓或土豪的槍彈下。

歐洲最朝不保夕，最低劣的工資，對於他們也是要比在本土裡活活等死的強。

在今天，社會累積迄今的科技知識，已經足以把世界上大多數人民被迫過著的貧困生活徹底中止。貧

困和社會剝奪實非必然。它們兩者皆是由通過剝削大多數人，為極少數人生產利潤的一個全盤地倒向少數富裕資本家的經濟組織所造成的結果。這樣的一個經濟組織，從很久以來已經是無法應付人類的需要。它不能向人類提供未來，而只能提供歐洲圍城的猙獰面孔，提供一個由芒刺和機槍守衛著的人工的「天堂」，而且只是向一小撮富人提供而已。

在交通運輸工具已經發展至能夠讓人們全無限制地在全世界各地通行旅遊的時代裡，民族國界的尚存及一再嚴守移民管制，只不過是維持一個已經過時的社會秩序的其中之一個手段而已。這個手段不僅是不公義和壓迫性的，而且從人類總體的觀點來看，更是荒謬而不理性的。

尋求庇護者和「非法」移民不是對英國工人階級的威脅。真正的威脅，是那些為了保護那個阻礙社會前進的社會秩序的政客和政府。唯有在摧毀這樣的一個社會制度之後，社會才能繼續前進。

2000年7月3日

（史丹摘譯自2000年7-8月號《階級鬥爭》）

日本又為棄改和平憲法、 復行戰爭權力大造輿論

高島義一

5月3日是憲法紀念日（註1），《讀賣新聞》報發表了《憲法修改第二次試行方案》。這個草案在「公共秩序」的名義下提出了許多可怕的内容，諸如：為國家的安全、秩序和公共的利益、福祉而限制基本的人權，糾正過份的個人主義；授予首相憑借軍警力量發佈戒嚴令，宣佈緊急狀態，集中一切權力，凍結基本人權等權力；為出台包括禁止建立有「革命」傾向的政黨等内容的《政黨法》而制定政黨條款；為壓制反對黨而降低眾議院的表決難度，削弱參議院的問政力量；等等；象徵了當今的「改憲論」的

本質，預示了現行憲法體系的根本的解體。

第一次和第二次試行方案的背景

1994年11月3日，《讀賣新聞》報發表了《憲法修改第一次試行方案》。其中，「寫明保持自衛力」，就是要放棄憲法第九條，讓自衛隊明文合法化，開放不加制止的擴軍之路；新增了「國際合作」的章節，意在使出兵海外合法化。

當時，因為社會黨徹底改變了（堅持近四十年的）主張，議會內形成了承認違反憲法建立的自衛隊

的多數派，重新提出全面明文改憲。《THIS IS讀賣》1994年12月號的《更改憲法的時刻到來啦》專集這樣寫道：「由於社會黨從認為自衛隊『違憲』的立場朝向『合憲』轉換的基本政策，政治性地全面解決憲法第九條問題的時機可說是終於來了！……對現行的第九條，解釋時容易混淆的情況的確存在。」若從此言推論，放棄第九條當然是必要的嘍。

而其實，第九條中「不保持陸海空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的文句根本沒有誤解的餘地。

到現在，自衛隊已經靠著全球數來也是名列前茅的高額軍費養大養肥而擁有巨大的軍事力量。如果說它不算是憲法所禁止持有的「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的話，那麼世界上有軍隊的國家幾乎只有美國了吧！

前不久，政府關於憲法第九條「只是放棄侵略戰爭，但不放棄自衛戰爭」的說明是錯誤的；而根據「反對（美國）強加（給日本）的憲法」的主張去回顧、了解（當年）憲法制定的過程，則越深入越明白。例如，被他們作為「強加」的證據提到的《麥克阿瑟筆記》，就清楚地寫著「也放棄自衛戰爭」，而表明他們「解釋時容易混淆」。

發表《憲法修改第二次試行方案》的背景是，由執政黨（先前是自民黨、自由黨、公明黨，眼下是自民黨、公明黨、保守黨）以及一部份在野黨（民主黨）的議員形成的改憲派佔據了提出「改憲倡議」所必需的三分之二以上的議席，繼國會的多數派近年制定了一系列支持形成能夠進行戰爭的國家體制的法律後，在國會設立了以「改憲倡議」為目標的「憲法調查會」，並憑借號稱有一千萬份的世界最大發行量的《讀賣新聞》報的巨大媒介力量，以一鼓作氣地加速改憲步伐。

放棄憲法第九條和走向戰爭的動員

第一次的讀賣試行方案放棄了現行憲法第九條中「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的條文，代之以「能夠持有為了自衛的組織」的表述，而第二次試行方案則更進一步地表達為「能夠持有為了自衛的軍隊」。

關於憲法中「放棄戰爭」和「放棄軍事力量」的內容，第二次的試行方案和前一次的基本上同樣地加以放棄。首先，對於規定了憲法的和平主義性質的憲

法前言做了大幅度更改，刪去了「決意不再發生由於政府的行為再次進行戰爭的慘禍」的部份。

其次，將憲法中「日本國民祝願永久的和平，基於對支配人類相互關係的崇高理念的深刻認識，決意信任和依靠熱愛和平的各國國民的公正和信義，保持我們的安全和生存」那有名的部份，改成了「日本國民祝願世界的永久和平，秉持國際協調的精神，面向實現國際社會的和平與安全，宣誓竭盡全力」。

此外，還刪除了「對過去的戰爭的反省」，並將「決意以非軍事的行為維持和平」變為「流血地為國際作貢獻；進而將現行第九條中「永遠放棄作為國家主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使用武力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這一部份中的「永遠放棄」一語改為「不承認」，理由是第九條所說「放棄」戰爭是指侵略戰爭，而上述那句畢竟不是在談放棄侵略戰爭。

這樣一來，就承認了名為「自衛戰爭」的戰爭，就會像四、五十年前國會圍繞第九條進行討論時當時的首相吉田茂也認為的那樣：「將迄今的侵略戰爭都為自衛戰爭的主張是可行的」，並讓海灣戰爭時叫喊過「流血地為國際作貢獻」的現任自由黨黨魁小澤一郎（當時是自民黨的幹事長）的「聯合國的軍事行動不是『作為國家主權發動的戰爭』，因此與憲法第九條沒有抵觸」的主張也成為可行的。

而且，第二次的讀賣試行方案中題為「國際合作」的章節就已經表示：「日本國對於已經確立的國際機構的活動將積極地共同努力；必要的場合，將派遣公務員，也可為維持、促進和平及人道支援活動提供為了自衛的軍隊」（第十三條）。而所謂「已經確立的國際機構」指的不只是聯合國，關於第一次試行方案的解說，就曾舉了CSCE（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為例，強調了日美安保條約等國際條約對憲法的限制；也就是說，包括日美並肩參加的戰爭在內的所有戰爭都有可能發生。

因此，必須否定使參加乃至發動戰爭合法化的改憲圖謀。

註1：日本為紀念1947年5月3日起實施由美國人主導制定的憲法而設的全國性假日。

（馮克瑞節選、編譯自日本時代社2000年5月29日發行的第1634號《橋樑》周刊所載高島義一的文章《讀賣第二次改憲試行方案……形成「能夠進行戰爭的國家」體制的動向……》，並重擬了總標題。）

駐韓美軍地位協定的現狀

趙京譯

在最近的朝鮮半島南北首腦會談中，南方特別強調美軍駐留問題不在討論議題之中；與此同時，美國政府不斷放風，聲稱即使朝鮮半島經驗後也不撤退駐韓美軍。在要求美軍全面撤退的韓國民眾與堅持美軍駐留的韓國政府之間，改善駐韓美軍地位協定（SOFA）成為許多市民團體與國會議員的鬥爭焦點。

當駐韓美軍一直流放劇毒物到漢江的事實暴露後，全面改正地位協定的要求更加強烈。7月14日的韓國臨時國會期間，在野黨的41個議員召開緊急會議，共同要求韓國政府就此與美國政府交涉。「不必擔心這樣的國會決議被北韓利用，也不用管美國政府的顏色。」「這樣的決議可能會讓美國吃驚，但我們必須有勇氣說『對不起，請撤走』，才能與美國平等地交涉。」「受到這樣的恥辱還沒有反美情緒的國民，怎麼會有生命力呢？」

韓國政府也不是無所作爲。它去年10月就向美國政府遞交了修改地位協定的交涉案。美國政府今年5月31日回覆了它的交涉案。據韓國國會統一外交通商委員會非公開會議的記錄，一言以蔽之，這是一個進一步要求韓國放棄審判權等的不平等方案。

「如果駐韓美軍司令官判斷美軍罪犯在被韓國拘捕期間重要的法權受到侵害、受到不公正審判時，韓國不得執行判決；美國方面要求引渡罪犯時，韓國必須引渡，否則就停止關於罪犯引渡的SOFA效力。」也就是說，駐韓美軍司令官的判斷高於韓國的司法權。美國方面進一步要求韓國放棄法定刑量三年以下的「輕微」犯罪的審判權，這實際上要求韓國放棄對於絕大多數美軍及其軍屬犯罪（飲酒駕駛、無執照駕駛，強暴、性脅迫等）的審判權。

至於韓國政府交涉案中提及的關於美軍部隊的環境污染、被美軍僱用的韓國人勞動權益等等，美國政府完全沒有提及。連韓國總理也承認：「美國方案背離了我們的期待，可以預想（8月2日）交涉會很困難。」

與駐日美軍地位協定（註）相類似，駐韓美軍地位協定來自於1954年生效的美韓相互防衛條約，其第四條規定「按照相互合約，大韓民國許可美國在大韓民國的領土及附近配置陸海空軍的權利，美國受諾之。」第六條規定：「本條約無限期有效。」

這樣，改正駐韓美軍地位協定的要求遇到了問題的實質與極限：美韓防衛條約，即駐韓美軍本身。只要駐韓美軍一日不撤離朝鮮半島，韓國的民眾就一日不能安寧。這與駐日美軍（及其美日安保條約）的情形完全相同。

（趙京2000年8月19日根據新時代社《橋樑》周刊2000年8月14日號譯自韓國的報道編寫）

譯者註：駐韓美國地位協定與駐日美軍地位協定的類似性質來自於美韓相互防衛條約與美日安保條約的共同性質，而且兩者相互依存的：修改或廢除一方協定必定會修改或廢除另一方協定，是美國政府最敏感的「東亞戰略」之「氧氣」。請參見筆者的《美日同盟：其起源、形成、現狀及其與中國的互動展望》（<http://cpri.tripod.com>）。



學生揮舞反政府標語，抗議國安法

沖繩允許美軍基地存在、 讓沖繩從屬及合併於日本的論調

國富建治

《沖繩時代》報上，關於「沖繩主導權」的論戰在繼續進行。按參加爭論的原社會大眾黨書記長、現縣政參事比嘉良彥6月6日見報的話說，「5月初的長假以後，早報和晚報上都展開『沖繩主導權』論爭的狀況」形成了。《沖繩時代》報上的論戰發生之前，《朝日新聞》報從5月15日至17日分三次介紹了關於「沖繩主導權」的提案。此外，進入6月，在另一份沖繩的主要報紙《琉球新聞》上，論戰也開始了。

到6月17日為止，參加《沖繩時代》報上的論戰的已達12人，包括了「沖繩主導權」提議人之一的高良倉吉和剛才提到的比嘉良彥。其中，來自日本「本土」的只有一人，是民族問題研究者太田昌國。論戰呈現出沖繩的知識份子總動員的模樣。進一步說，或是從「論戰」來說，除了提議人高良、大城倆，以及事實上是稻嶺知事為首的沖繩縣政府的智囊，立場與高良等人相近而又巧妙地避開贊成與否表態的比嘉良彥外，佔壓倒性多數的論戰參加者對於「沖繩主導權」的觀點從正面給予了批判。

為日本的國家戰略做貢獻

那麼，稱為「沖繩主導權」的是什麼呢？是琉球大學的高良倉吉、大城常夫、真榮城守定三位教授在向今年3月於那霸市內召開，由日本國際交流中心主辦，讓亞洲各國的研究者交換關於文化、經濟、安全保障的意見的亞太地區待議事項研究計劃「沖繩討論會」提交的報告中共同提倡的觀點。《沖繩時代》報從5月3日到1日分7次連載了這份報告。

這份報告提出的問題是其所謂的：「我國要進一步發揮作為亞太地區負有責任的主體的作用，同時作為全球性大國而做出獨立的貢獻的一種存在，不能迴避關於沖繩的再評價及其活用方法的問題」。說到底也就是，為使「我國」成為面向亞太地區的全球性大國，沖繩必須起怎樣的作用。那也就是說，沖繩決定自己的未來而形成「日本的國家戰略」這一不可動搖

的前提。為什麼呢？因為說是沖繩的居民通過回歸本土「自己的適合歸屬的國家是日本的選擇」。

當然，並不是否定那些提倡者——他們提倡沖繩和所謂的生根於沖繩的歷史經驗的「日本」的特別關係（即應該稱為因與大和的關係而生的沖繩的「歷史意識」）的存在。但是他們否定「要求負起對於歷史做過度說明的責任的理論」，主張作為「現在活著的人」，「我們不能認為『歷史問題』只是沖繩的問題，要為了整個日本，進而為了亞太地區和全世界來通盤考慮怎樣努力解決」。這種所謂面向「全球主義」而揚棄「地域感情」的主張，讓人很容易地看出和認為其意在於使沖繩最終完成與日本國的自發的合併。

這種立場歸結出了露骨地允許美軍基地在沖繩存在的論調：「我們三人基於評估存在於亞太地區進而對於國際社會的日美同盟所起的安全保障作用的立場，同意以此同盟的必需為限的美軍基地存在於沖繩。就是說，具有從保障方面來說沖繩作為我們國家裡貢獻度最高的地區而存在著這一共識」。

基於上述立場和認識，他們三人因認為「對於妨礙和平與安定的主要因素，作為通過聯合國做媒介的最大限度的選擇，行使軍事力量是必要的」，而極端地認為，「對現在的美軍基地問題，不是追究它的存在是好還是壞的問題，而是能否和怎樣調整、消除有效的運用與居民生活的安定之間的矛盾問題」，在沖繩美軍基地的是非「作為問題已經不存在」。他們三人還主張，（沖繩人）不是作為「基地的檢舉人」，必須成為「對安全保障做出很大貢獻的地區」的「檢查」「基地使用應有規範」的當事人。

這裡，他們提出的是（沖繩）作為構築「21世紀的日本的國家像」的「共同事業者」的形象；他們還為表現這點而提議在沖繩建碑，並擬了兩句碑文：「這裡是日本的盡頭、亞洲的起始」，「這裡是亞洲的盡頭、日本的起始」。

這碑文的底稿，正如共同通信社的伊高浩昭指出的那樣，是模仿了位於歐洲西端、突入大西洋的葡萄牙的羅卡角的碑文「這裡是陸地的盡頭、海洋的起始」，而且將沖繩作為與「日本」有別的亞洲諸國的一員的交往的經驗，徹底地吸收到「日本身份」裡，由此明白地把授予沖繩以「全球性大國・日本」朝向亞洲的最前沿的地位的意圖包括了進去。

「海洋的起始」的羅卡角的對岸，是隨著五百多年前哥倫布的到達而開始遭受西歐的侵略和殖民地統治、原住民族成為了大屠殺對象的美洲大陸。「亞洲的起始」連接的亞洲，是成為舊日本帝國主義軍事侵略對象的亞洲，是現在仍是謀求生存「全球性大國」日本的霸權的對象的亞洲。

為日美安保體制積極做貢獻

上述的提議人的中心人物高良倉吉，是戰後（1947年）出生的充滿銳氣的沖繩的歷史學者、受到注目的人物。他是NHK的電視連續劇《大河》中《琉球的風》一集的主編，並作為岩波出版社的新書《琉球王國》的作者，為發掘和喚醒歷史的「琉球身份」盡了力。在《沖繩的自我驗證——三人談・從「情感」到「道理」》那本他兩年前出版、發行的書中，他和這次「沖繩主導權」共同提議人之一的真榮城守定及現任沖繩縣副知事牧野浩隆（當時任琉球銀行常勤監查役）進行了三人談，反復強調了「沖繩有提出問題的能力，但是缺乏解決問題的能力」，提出秉持「優質的馬基雅弗利主義（譯者註：權謀術數主義）」，「沖繩有決心自主經營日本中的沖繩」。

他所說的「優質的馬基雅弗利主義」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是要把沖繩現今積極地推上對日美安保同盟「貢獻」最大者的位置，最終使之自願、主動地成為尖兵。

高良到處說，「（沖繩）是這樣一個地區，人們懷著對自己的歷史、文化的自豪，帶著作為少數民族而感受到的悲痛和苦惱，抱著憎惡戰爭、愛好和平的強烈意念和把這種經歷、體驗轉告給廣大世人的願望」，也就是在說，不僅是對於日本，也對於亞洲，沖繩持有的「財產」是種「柔軟的力量」，因而要呼喚沖繩通過這種「柔軟的力量」為塑造將來的日本的國家像做貢獻，而且作為前提地容納美軍基地這一最大的侵略的「堅硬的力量」。真可謂是日本政府為沖繩八國首腦會議所提宣傳口號「發自沖繩的和平信

號」的忠實翻版。

記者新川明（沖繩時代報社原社長）批判說，這個「提議」「只是督促、鼓勵沖繩人『大政翼贊（譯者註：協助、輔佐國家大政）』，向日本國政府宣誓成為日本國的『尖兵』的標語」。島嶼研究家松島泰勝說，把共同提議的三人放在出自沖繩、朝向近代日本國家的「同化主義者」系列的位置上。琉球大學的教員保板廣志認為，「提議」是「努力制作新的國家像——神話的政治的祝詞」。沖繩大學教員新崎盛輝斷定其罪說，是「現狀追認論者的語言遊戲，觀念論」。季刊《EDGE》的總編輯仲里效稱高良是「流亡到和沖繩的歷史與經驗相反的『新日本』的國家主義者」。

這些話都尖銳、中肯地批判了「提議」的本質。所謂的「沖繩主導權」，與它的字面所表示的正相反，其目的只是要讓沖繩接受「日本國家的主導權」乃至「美日防務合作指針的主導權」。

共同提議人之一的大城夫說，「如果沒有沖繩是日本的一個縣的認識的話，談論沖繩的21世紀像、國家像、聯邦制、沖繩特別自治區、地方分權的擴大等地區像、安全保障問題、美軍基地和地方振興問題都將是不可能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批判者們首先應該表明對沖繩歸屬問題的態度」。同時，他還強調了美軍是亞太地區的「安全的保證人」、「地區均衡的維持者」，並把俄國、中國和亞洲各國對在日美軍基地所起作用的評價作為自己等人立論的根據。

可是，沖繩「歸屬」到哪裡的問題，以及對日美安全保體制和在日美軍基地的作用予以積極的肯定，都完全是另外的話題。即便是承認沖繩為「日本的一員」的話，將其和接受日美安保體制及在日美軍基地的存在直接聯繫、等同起來，也是很不對的。

他們的主張和去年由於篡改重新建造的沖繩祈禱和平資料館內容的問題所顯示出來的想要瓦解生根於沖繩的戰爭、戰後體驗歷史意識的動向是一致的；身為歷史學者的高良倉吉對於這個篡改展示內容的問題只是完全沉默，但是他寧可站在篡改歷史的稻嶺之流之一邊的做法，顯示了他的意向和稻嶺知事為首的沖繩縣政府的動向是緊密結合的。

（馮克瑞2000年8月於美國歐德道明寧大學節譯自日本時代社同年7月3日發行的第1639號《橋樑》周刊。）

不要新的勞動法！

——致全世界進步組織

全俄保衛現存勞動法行動協調委員會

親愛的同志們：

俄羅斯政府和普京總統計劃匆忙通過國家杜馬推出一個新的野蠻的反工人的勞動法。這個法規將使我們工人階級喪失反對新老閥專橫和國家當局的法定依據。

政府的勞動法草案，使僱主解僱工人、工作時間的規定和工作標準，無須徵求行業工會的同意而得到實行。這個勞動法從資本家的報復中有效地廢止八小時工作日和工會聯合會活動之受法律保障；使不受限制的超時勞動、沒有加班報酬和削弱攜帶小孩工作的母親的保障得到合法化。

統治階級的行政委員會準備強加這個法案在俄羅斯工人的頭上，把他們扔回到沙皇的時代。新近被選舉出來的普京總統，曾在國家杜馬的會議上宣佈：勞動法草案將在近期送到杜馬，並且有把握地預示這個法規將被採納。

如果採納這個勞動法，勢必摧毀工會工作的合法基礎，和保衛工人權利的全部法律途徑。獨立的工人組織——工會「保衛」聯盟和其他的——反對資產階級的能力勢將被消除。俄羅斯工人的這種失敗，對於全世界工人階級鬥爭的成果將會產生嚴重的後果。

工會保衛聯盟同這個勞動法鬥爭已有4年了，並且迄今為止都在設法阻止它被通過。但是，這個鬥爭對於我們來說將艱難得多，因為新的國家杜馬比上一屆更加反動。

我們正在準備全俄行動，保衛現存的勞動法。4月4日，全俄鬥爭保衛勞動法協調委員會在莫斯科成立。

5月17日，委員會計劃組織聯合行動日，提出下面的要求：

反對政府的勞動法、短期合同和企業主及官方的專橫！

擁護工人集體管理企業！

在這個鬥爭中，我們估算來自國際左派和進步力量的支持會非常之多。這個支持會包括大量的新聞媒體和互聯網發放關於進攻工人階級權利的新聞報道，以傳真和郵電送給俄羅斯政府及國家杜馬代表，向俄羅斯大使館和領事館提出抗議。

如果政府對它的反勞工立法遇上國內和國際的嚴重抵抗，我們就有好機會能夠擋開俄羅斯資產階級的邪惡進攻。

我們請求外國同志、工會、左派和進步組織團結在這個鬥爭之中。

這是對最後保持十月革命戰利品的支持。

反對奴役〔工人的〕法規！贊成〔保護〕勞工的法規！

請同我們聯繫！

全俄保衛現存勞動法協調委員會：

工會委員會主席A.莎基娜等17個團體負責人（簽署）

（楊萍譯自《工人國際報》2000年5、6月號）



俄羅斯的抗議浪潮〈工人國際報〉

〔這個報告是根據「國際團結與蘇聯工人」提供的資料直到最近聯繫所得的消息寫成〕

2000年5月17日，近30萬名工人橫越俄羅斯，參加抗議政府建議採納一個殘酷的新的勞動法。

出動最多的地區，包括加里寧格勒15萬工人、阿斯特拉克汗1萬人、諾伏西比爾斯克8千人、尼茲喀聶、諾伏哥羅克德的一個工廠有8千人參加、沙馬拉4千人、莫斯科地區4千人、歐姆斯克2千人、柯彌公眾2千人（包括在歐洲最大礦山的公眾大會1千人）。

某些工人小組顯示出他們自己的特色。例如碼頭工人有15萬人在弗萊迪窩斯托克、窩斯托赤尼、納克荷德卡等8個港口參加抗議。

在雅司諾哥爾斯克機器廠，當它的無畏的工人在長時間鬥爭中獲得空前勝利時，工人們享有盛名，有3,500人參加了罷工。

在庫爾斯克和弗萊迪窩斯托克，不管本地的禁令，舉行了遊行示威運動。

大部份的功績歸於地下活動份子，尤其是「保衛」這個組織和碼頭工人工會，由一個杜馬議員奧勒格·塞因建立起來的一個委員會的協作和富有戰鬥性的工人的幫助，這好像在雅司諾哥爾斯克和維波爾格，積極份子為建立一個工人黨的運動那樣，等等。

儘管參加行動日播散得很廣，許多不是「保衛」成員的工人或者以前從來沒有參加工業行動的人，覺得反對新勞動法對他們是沒有重大關係的。這是因為這麼多的俄羅斯工人曾經忍受這種狀況，對此，新法規給予官方的印記——隨著資本家的高興給予報酬，專橫的解僱，臨時的工作，根本就沒有文字合同，長時間的勞動，沒有任何休假。

隨著幾近50%的蘇聯工業瓦解、私有化被引進以來，失業和沒有工資的工人，達到18個月或者更長的時間，是那麼普遍，以致許多人準備忍受任何條件和工作時間，只承諾給予一些現金。面對這種背景，行動日是一個重大的勝利。

在莫斯科靠近汽車工廠的地鐵車站，大約有350個罷工者和他們的支持者開了一個會，通過決議抗議新的勞動法，並支持來自獨立工會「保衛」和Sotsprof、西伯利亞勞工同盟、碼頭工人工會及其他進步組織的建議，為了組織和協調行動、保衛工人的權利而產生一個參謀機構。這個決議號召所有的工人組織、行業工會和積極份子，實行堅決的行動，反對政府的計劃以及它的資產階級支持者。

在公眾的集會上，V.M.彼得羅夫提醒聽眾，來自國

際貨幣基金會的推動，修正勞動法。

阿爾格·塞恩回想歷史上企圖修正或者革新勞動法的，實際上就是非法的法律化。他自信，即使他們取消了工人的權利，商人們也將不會解決他們的問題，而人民將被迫用更堅固的方式去為他們的權利而鬥爭。塞恩譴責官方的工會聯合會（FNPR）指示本地的組織不參加行動日，但它的許多分會實際上已經參加了。

S.V.喀拉莫夫、Sotsprof工會主席簡短強調說：行動日證明工人們既非牛群，也不是奴隸。

T.撒基娜、一位工作於教育綜合企業的婦女，譴責那些支持勞動法的人，他們「自稱」自己為共產主義者，並且拍打他們的胸膛，但只執行反民族的法律，求助於久加諾夫為領袖的俄羅斯聯邦共產黨。聽眾中有支持的和抗議的喊聲，並且爆發了混戰。

當撒基娜譴責在車臣共和國的大屠殺時，V.I.安皮洛夫的「俄羅斯勞工」支持者更進一步打斷她的發言。

V.I.舒茨卡列夫代表芝爾轎車工人警告聽眾不要把八小時工作日作轉讓，因為它曾經是在艱苦的階級鬥爭中贏來的。他說，莫爾德維和烏克蘭的工人被迫每天工作16小時，把資方的苛待全都爆光了。而「政府希望把俄羅斯的工人置於同樣的地位。」

窩爾庫特的一位礦工代表V.I.波蒂斯尼耶說，資產階級希望分裂工人階級運動，撫慰一些小組，因為十年前它曾經同礦工們一起幹過，隨著社會主義的失敗，工人們已經喪失了全部權利，波蒂斯尼耶誓言：如果有人壓迫人，政府將不允許工人管理工廠。

一位屬於「Sotsprof」的機械工人，N.艾溫諾夫說，計劃中的勞動法「不只簡單地摧毀工人的權利，而且牴觸了國家民族的利益，因為，只有自由的公民才能做出高質量的工作。」

一位鐵路工會的代表V.V.雅柏列夫爭辯說，在社會主義之下「勞動法是神秘的書，工人們知道勞動法不總是適宜於實施的。」現在杜馬的議員正在要求取消勞動法中僱主不實施的那些項目，而保留那些實施的條款。新增加到勞動法的部份，專用於鐵路工人和教師，把軍事紀律引進這些範圍。

其他的演講者包括Zaschita協調人D.V.傑庫舍夫，烏拉爾斯克Mellalist工廠的工會主席，莫斯科反法西斯委員會主席O.費德朱可夫，A.尼柯拉耶夫代表RIK，從當地Zaschita分會帶來祝賀的一個礦工，O.巴比赤及其他人。

（楊萍譯自《工人國際報》2000年5/6月號）

悼念托洛茨基被謀殺六十週年

斯大林謀害我的生命

1940年6月8日

〔1940年8月20日，斯大林派遣兇手殺害了托洛茨基。在60年後的今天，我們特譯刊出以下這篇文章，那是托洛茨基逝世前不到3個半月遭到格柏烏武裝突襲失敗後寫的。從下面這篇文章的述評中，可以了解到托氏隨後不久被殺害的來龍去脈和斯大林——格柏烏的無可推諉罪責。——編者。〕

襲擊在清晨大約4點鐘發生。我在一整天艱辛工作之後，服了一點安眠藥，睡得很酣。我被一輪槍聲吵醒，但感覺仍是十分迷糊。最先想像到的是，我們的家牆外面，正在放煙花慶祝國慶日。可是爆破聲是太迫近了，就在房間裡，近在咫尺，打我的上空發生。火藥味愈來愈強烈，愈來愈滲透進來。很清楚了：我們一向預期中的事情正在眼下發生——我們在受到襲擊。駐守在圍牆的警察到哪兒去了？牆內的守衛呢？給捆綁起來了嗎？給綁架了嗎？還是被殺害了？我的妻子早已經跳下床來。槍擊聲持續不斷。妻子後來告訴我，是她幫助我下床，把我推到就在睡床和牆壁之間的空隙處。這可是不假。她就一直靠近牆邊俯伏在我的身前，彷彿是要用她自己的身體給我作護盾。但我用低語和示意勸說她伏到地面去。槍聲來自四方八面，很難說得準是從哪個方向而來。有一段時間，妻子——她後來告訴我——能夠清楚地聽出從一管槍迸發出來的連珠彈藥：射擊就是從我們房間這裡發出的，雖然我們無法看到什麼人。窗台和牆壁的玻璃和碎片橫飛直射。過了一會兒，我感到右腿有兩處輕微受了傷。

槍聲悄靜下來，我們聽到孫兒在隔鄰房間大聲喊叫：「祖父啊！」在黑暗中的槍聲下，孩兒的叫喊聲就成了我那夜最刻骨銘心的悲慘記憶。孫兒乍聽到第一下槍聲——這第一下槍擊，據門上和牆壁的彈孔所印證，就從他的床上斜越而過——立刻滾到床底下去。其中的一個突擊者，顯然是出於驚慌而向床間開了槍；子彈穿透褥墊，擊中孫兒的大腳趾，最後嵌進地板裡。突擊者們投擲了兩個燃燒彈，然後才離開孫兒的房間。孫兒高喊著：「祖父啊！」一邊追隨他們跑到院子去，身後拖出一道長長的血印；然後，他冒



托洛茨基

著槍彈跑到其中一個守衛的房間去。

妻子在聽到孫兒的喊叫聲後，摸索到他的房間來。那時房間已經空無一人，房間的地板、門板和一個小櫥櫃正在著火燃燒。「他們把謝瓦給綁架了。」我對她說。這是至為痛苦的一刻。槍聲仍舊響起，只是已經離開我們的睡房而移到院子裡，或只就在牆壁後面發生。恐怖分子們顯然正在放冷槍撤退。妻子匆忙執起一條氈子撲火。她在隨後的一個星期裡得把火傷治療。

我們的守衛中的兩人出現了：奧圖和查爾斯。機關槍突襲的槍林彈雨把他們和我們隔開。他們證實突擊者顯然是已經撤退了，因為院子裡看不到有人。夜更守衛羅伯特·舒爾敦·哈特不見了。汽車也同時失蹤。為什麼駐守在外面的警察無聲無息？他們給高喊著「阿爾馬桑萬歲！」（註）的突擊者捆綁起來了。這是由被捆縛的警察所說的故事。

在翌日，妻子和我都確信，突擊者顯然是從窗戶和房門間向我們開火，其中沒有一人進入過我們的睡房。可是，對於射在兩張睡床前端那堵牆上的8槍，它們分別在兩張褥墊造成的4個小孔，以及在床下的地板上所留下的痕跡而作的彈道走勢的分析，無可辯駁地證明了這些槍擊只可能是在房間裡發出的。在地板上我們的子彈空殼，和襯裡有兩處燙燒的一張氈子，證實了相同的判斷。

恐怖分子是在什麼時候進入我們的房間呢？是在他們行動的上半部即我們仍未甦醒之前，還是相反，就在後來我們伏在地板上那段最後的時間？我傾向於後一項假設。突擊者從窗口和門間向著睡床發射數顆子彈之後，聽不到有任何叫喊或呻吟，他們有充分的理由作出結論，認為已經成功地完成工作。他們的其中一個，或許在最後的關頭裡進入了房間，以作最後的檢查。床上的被舖和枕頭或許仍然保持著人體的形狀，這是有可能的。在清晨4時許，房間裡一切漆黑。妻子和我仍然無聲無息地癱伏在地下。那個進來檢查行動結果的恐怖分子，或許還向我們的睡床補發數槍，以讓他的「良知安心」吧。

* * *

對於那些由誤解或惡意製造出來的，直接或間接地給所謂「自我襲擊」論提供基礎的各種傳言，若是逐一的作出巨細無遺的分析，會是太招人厭煩的了。有報章的報道指稱，在突襲當晚，妻子和我俱不在睡房裡；《民眾報》（斯大林的同夥托尼丹諾的喉舌報）就我的「互相矛盾」加以論說：有一種說法是，我報道說我爬向睡房的一角；而另一種說法是，我摔落到地板上；諸如此類。所有這些說法，沒有一則是真實的。我們的房子，在夜裡，所有的房間都有特定的人在裡面，除卻書房、飯廳，及我個人的工作室是例外。突擊者穿越所有這些房間，沒有碰到我們一人。我們就睡在經常是我們睡覺的地方：我們的睡房裡。就像前面所說的，我倒落在房間一角的地板上，妻子當時也加入來。

我們是怎麼得以生還的？很明顯是由於一場幸運的意外。睡床是受到兩面對向的槍火射擊。突擊者大概由於害怕互相擊中而本能地朝較高或朝較低的角度發射。但這僅屬於心理猜測。也有可能是由於妻子和我沒有喪失理智，從而得到可喜的意外之助：我們靜悄悄地伏在地上裝死，而沒有在房裡亂跑，沒有在絕望之時大吵大叫求助，沒有毫無意義地胡亂放槍還擊。

斯大林幫之首先把我流放，然後企圖在外地把我

殺害，這在沒有創見的人看來，或許是無法理解的。要是像對其他許多人一般，在莫斯科便把我殺害，那不是更簡單嗎？

這就是解釋：在1928年把我驅逐出黨及流放到中亞細亞的那個時候，莫說是槍殺，而且連談到逮捕也是不可能的。我與之一起共同經歷了十月革命和內戰的那一輩代人仍然健在。政治局感到陷入四面楚歌中。

我從中亞細亞能夠和反對派維持直接的聯繫。在這種種狀況下，斯大林在經過1年來的舉棋不定之後決定，把我流放到外國去是最少遺害的辦法。按他的推想，從莫斯科隔離出的托洛茨基，被剝奪了機關和物質資源之後，將是完全無權無勢，辦不了任何的事情。斯大林還費盡心機，估計他把我在全國的眼裡完全抹黑之後，他可以毫無困難的從友國土耳其的手中把我討回來，以便在莫斯科給我來個總算賬。可是事態表明，不擁有任何機關或物質資源，也是完全可能參與政治生活的。我在年輕朋友的協助下給第四國際奠定基礎，它正在穩步向前，步履雖緩但卻堅忍不拔。1936-37年的莫斯科大審判，是爲了把我從挪威遞解回國而開出來的一台戲；那就是說，是爲了把我交到格柏烏秘密警察之手而設的。但這事沒有成功。我抵達了墨西哥。我得到消息說，斯大林有好幾次承認，把我流放到外國是一項「重大的錯誤」。除了訴諸恐怖行動，無從糾正這宗錯誤。

* * *

格柏烏近年來消滅了我數以百計的友人，其中包括了我在蘇聯的家人。在西班牙，他們殺害了我的前秘書愛爾文·吳爾夫及我的一些政治同路人；在巴黎，他們殺害了我的兒子里昂·西道夫——斯大林的職業殺手把他追蹤了2年。在〔瑞士〕洛桑，格柏烏殺害了伊尼亞斯·賴斯——賴斯脫離了格柏烏而加入第四國際。在巴黎，斯大林的間諜謀殺了我又一個前秘書魯道夫·克萊門特——他的屍體在塞納河被發現，其中頭、手、腳全被斫掉。這張受害者名單還可以數不盡的數下去。

在墨西哥，有過一次暗殺我的明顯企圖：有個人拿著一張偽造的政治要人的介紹信來到我家。這宗事件令我們的友人警覺到，有必要採取更爲嚴密的保安措施：設立日夜輪班的守衛、設置警報系統等等。

格柏烏積極參與西班牙事件，並且進行實實在在的謀殺；自此以後，我收到主要是來自紐約和巴黎的友人的許多信件，都是關於從法國或美國派到墨西哥的格柏烏的特務的。部份這些先生們的名字和照片，

我適時地轉交給墨西哥的警察去了。在〔第二次〕大戰爆發，由於我對克里姆林宮的對內政策和外交政策所作的絕不妥協的鬥爭，局面是更加惡化了。我在全世界報章上發表的宣言和文章——關於瓜分波蘭、入侵芬蘭、被斯大林斫去首腦的紅軍之脆弱等等問題——在全世界各國數以千萬計的給重印。蘇聯的內部不滿與時俱增。斯大林之作爲一個從前的革命者，他記起了在上一次大戰開始之初，那時的第三國際，比起今天的第四國際，是薄弱得多的。戰爭的進程或許會給第四國際的發展提供有力的推動，而且也會在蘇聯的內部發展。此所以，斯大林不會不給他的特務發出指令：盡可能快些把我結束。

因此，從眾所周知的事實和總體的政治考慮可見，俱無可置疑的展示出，組織5月24日的暗殺企圖只能是來自格柏烏。況且還有補充性的證據哩：

1) 在暗殺行動發生前數個星期，墨西哥報章上滿載有關於格柏烏特務群集到墨西哥的傳言。在這些報道裡，有許多內容都是子虛烏有，可是傳聞的本旨則是正確的。

2) 襲擊技術之高超值得十二分的注意。暗殺之所以失敗，就和每次戰爭皆有意外事故的登臨一樣：戰爭和意外事故是不可或分的。襲擊在規模、計劃和效率方面所作的準備和執行，實在教人嘖嘖稱奇。恐怖分子對房子的規劃和房子內部的活動情形瞭如指掌；他們配備有警察制服、武器、電鋸、繩梯等等。他們徹底成功地把駐守在房子外的警察網縛，正確地使用開火的策略而把屋內的守衛癱瘓下來，他們深入到行刺目標的房間，不受懲罰地開火3至5分鐘，投擲燃燒彈，然後不留痕跡地離開襲擊現場。像這般利落的行動，私人集團是辦不來的；遵行這樣的行動需有其傳統、訓練、龐大的資源和一大群各式各樣可以精挑細選的劊子手。這就是格柏烏的工作。

3) 襲擊計劃本身的其中一環，是急不及待的把調查轉移到錯誤的軌道去，這是嚴格地遵照格柏烏的整套方法的。襲擊者一邊把警察網綁，一邊高呼「阿爾馬桑萬歲！」這種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向著5個警察——其中有3個在睡覺——惺惺作態的呼喊，是旨在一石二鳥：一是爲了轉移視線，以讓在未來的數天或哪怕只是數小時裡，不向格柏烏及其在墨西哥的特務作調查；二是爲了挫害總統競選人之一的追隨者。格柏烏——更準確的說，它的授意者斯大林的典型手法，就是在殺害一個反對者之餘，把可疑點嫁禍到另一個反對者的身上。

4) 襲擊者隨身帶來了幾個燃燒彈，其中兩個投

擲到我們的孫子的房間。從而，有份參與其事的襲擊者所考慮到的，不僅是謀殺，而且還有縱火一項。他們縱火的唯一的目的，就是把我的檔案庫毀滅。我的檔案庫，在反對莫斯科的寡頭集團的鬥爭中，對我具有無可比擬的價值，此所以，我的檔案庫的毀滅，唯有對斯大林才是有利。在我的檔案庫的幫助之下，我對莫斯科審判所捏造的冤案假案之揭露尤其玲瓏突現。早在1936年11月7日，格柏烏在蒙受重大風險之下竊取了我在巴黎的檔案庫的一部份。格柏烏在5月24日這次對檔案庫也念念不忘。因此，那些燃燒彈，就猶如是斯大林的到訪名片一般。

5) 格柏烏罪行富有特色的一點，就是在秘密殺手和所謂「合法友人」之間的分工：格柏烏在一邊廂進行地下密謀，爲襲擊作出準備，另一邊廂就發動誹謗攻勢，旨在令襲擊對象名譽掃地。這種分工在行事之後照辦如儀：恐怖分子躲藏起來，而他們在光天白日下的業務代理人就試圖把警察的注意力引導向錯誤的路線。

6) 最後，不可能不注意全世界報章的反響：各類傾向的新聞報章，皆公開地或心照不宣地把這次襲擊當作是格柏烏一手包辦的事情來處理；唯有由克里姆林宮所津貼、俯首聽命於克里姆林宮的報章，才會爲相反的版本說項。這就是無可辯駁的政治證據！

5月24日早上，一群來自警察的主要代表請求我協助查案。薩拉薩上校和10名人員登門到訪，十分友善的向我查詢種種資料。我的家人、同事和我自己皆竭盡所能給予協助。

在5月25日或26日，有2位秘密警察人員對我說，調查在正確的路徑上，而不管如何，現在已經「證明是一宗企圖行刺案」。這教我大吃一驚。發生了這麼一場大事故，還有需要去作出證明嗎？我不禁自問，警察有必要去證明這次襲擊的確是一次襲擊，他們到底是爲了防備誰呢？無論如何，直到5月27日爲止，依我所能判斷，調查所指向的對象是那些不知名的襲擊者，而不是受到侵襲的受害人。5月28日，我把一些資料傳遞給薩拉薩上校；那些資料，據調查的第三個階段所表明，是非常重要的。可是那時的調查日程是屬於第二階段，也就是說，我沒有疑心到調查的對象竟然是指向我本人及我的合作者們。

就在5月28日這天，調查的方向及警察對待我們一家的態度，就在這一整天裡準備就緒，並且完成了徹頭徹尾的截然倒向。我們立時被敵意重重的包圍。出了什麼事啊？我們這麼疑竇著。這種轉向不會是自然發生的。必是有著具體而專橫的理由。讓調查的轉

向得以成立的，哪怕是似是而非的事實或事實的數據，皆沒有露出一點兒，而且也不可能露出一點兒。除了是格柏烏機器通過它各種各樣的「友人們」所施加的萬惡的壓力，我找不出其他理由來解釋這個轉向。就在幕後，發生了一場十足的政變。是誰在指揮呢？

在此有一項事實，看似無足輕重，而其實值得至為嚴肅的關注：5月27日的早報《民眾報》和《國民報》，同時刊載了同一篇文章《托洛茨基先生自相矛盾》，就關於5月24日當晚及正在突襲期間我到底身在何處的問題，歸咎我自相矛盾。我在那狂亂的時刻裡，完全沒有注意到這則從頭到尾通篇盡是無中生有的故事。是誰向這兩份「左」報提供這則故事呢？這是個至關重要的問題！這則故事是引述一個匿名的「觀察者」的消息來源。這些「觀察者」是誰？他們是從何處觀察？觀察了什麼？這是相當不言而喻的：這則故事的用意，是為了在政府圈子的眼中作出準備，以讓調查在作出敵意的轉向而針對我及我的合作者們的時候，有著正當的理由。這兩份報章，在政府圈子裡是被廣為閱讀的。對這段奇特的插曲加以調查，無疑將令許多事情昭然若揭。

在5月28日，也就是在我們已經被敵意的氛圍所窒息，而且警察的想法已經被引導向自我襲擊論的當日，我們家有2名家傭首次受到查詢。在翌日，29號，這兩位女工再被帶走查問；她們在下午4時被帶到馬德拉街的建築物內被查問至深夜11時，然後從深夜11時到凌晨2時給帶到一個黑暗的院子裡，在一輛汽車裡繼續被查問。有關於這整場查問，沒有紀錄留下。她們約在凌晨3時才被送回家。5月30日，一名警察人員來到我家廚房，向這兩名女傭出示一份早已擬備的紀錄文件；她們兩人未經閱讀便把文件簽署。她們兩人後來從報章上發現，我的兩名秘書查爾斯和奧托是根據她們的口供而受到逮捕；她們都聲明，她們在被查問的時候說過的話絕對是不能成為她們被捕的正當理由。

為什麼是這兩名守衛，而非其他人被捕？因為奧托和查爾斯的職責，是充當我和當局人員，及我和城內少數幾個朋友之間的聯絡人。在準備向我發出攻擊之先，調查官員們決定先行把我們的家居完全隔離。在同一天裡，我們有兩位年輕朋友，一位墨西哥人S.和一位捷克人B.，來到我們家拜訪以示慰問；他們都被逮捕了。逮捕的用意是完全一致的，就是為了切斷我們和外間世界的聯繫。被逮捕的兩名守衛，被要求在「一刻鐘」內招供說是我下的令要他們執行「自我

襲擊」的。我完全無意誇大這些小插曲的重要性，也不是要引伸出什麼悲劇性的意義。這些小插曲之使我感興趣，僅僅是從這個觀點出發的：它們有可能把那些得以在短短的24小時裡使調查的方向發生幾乎是魔幻性轉向的幕後黑手揭露出來。就是時至今天，這些黑手仍然對調查的進程施加影響力。

在5月30日星期四，當B.在馬德拉街被查問的時候，所有警察人員都是從自我襲擊論為出發點入手，橫蠻傲慢地對待我本人、我妻子和我的合作者們。S.在受關閉的4天裡，有機會聽到警察人員之間的一些交談。S.遂有如下的結論：「倫巴度·托尼丹諾和巴索爾斯等人插手警察的活動至深，而且相當收效。關於自我襲擊的見解……就是從那些來源人為地促成的。」

有利益牽涉的圈子必定是施加了無以復增的壓力，以迫使調查的代表認真地看待自我襲擊論這個荒唐的見解。

我能從這般可怕、可厭而又危險的投機冒險行為裡達到什麼目的呢？時至今日，仍沒有人給以解釋。有種暗示謂我想把斯大林及他的格柏烏抹黑。可是，對於一個把整整一個輩代的老布爾什維克黨全盤毀滅的人，多出那麼的一次襲擊還會給他的污名更增一點什麼嗎？有一種說法，是我想證明有「第五縱隊」的存在。但我為什麼要這樣做？為了什麼？再說，由格柏烏的人員來執行襲擊行動已是相當綽綽有餘，實在毋須多來一個神秘莫測的第五縱隊。又有說我是想給墨西哥政府製造麻煩。我給這麼一個唯一的慫恿待我的政府製造麻煩，卻又動機何在呢？有說我是想挑動美國和墨西哥之間爆發戰爭。這種解釋完全入於狂言亂語的範疇。若要挑動這麼的一場戰爭，組織一次攻擊美國大使或石油大亨的襲擊行動，無論如何是要比襲擊一個布爾什維克革命者遠要有利得多；布爾什維克革命者在帝國主義的圈子裡是個異己分子，被深惡痛絕的人。

斯大林組織一次暗殺我的行動，他的行動的意義是清楚的：他要消滅他的頭號敵人。斯大林不會在這次行動裡招來風險；他在遠距離裡行動。而我卻剛好相反：我若組織一場「自我襲擊」，就要自行為這種冒險行動承擔責任，把我本人的命運、我家的命運、我的政治信譽及我所為之效勞的運動的信譽都承受風險。我要從中得著什麼呢？

可是啊，就讓我們容許那不可能的事發生吧，也就是說，我放棄了我整個生命所遵循的事業，把通常常識和對我個人至關重要的利益踐踏於腳下，出於某

些不明的原因而確實是決定了組織一次「自我襲擊」的行動。那麼，還有餘下來的這些問題等待解答：我從哪裡，又如何能得到那20個執行者呢？我怎樣能向他們提供警察服裝呢？我怎樣能把他們武裝起來呢？我怎樣能提供他們所需要的配備呢？諸如此類的問題。換言之，一個與外界幾乎完全隔離的單一個人，怎樣能夠設法做到只有一個強有力的機器才能想望的冒險行動？把這麼一種完全不值得批評的見解拿出來批評——且讓我坦白承認吧，我感到古怪。

格柏烏以高超的技巧把它的人員發動起來，為的是把我殺死。出於意外的緣故，這次暗殺企圖失敗了。格柏烏的友人們現在受到損害。他們現在不得不竭盡所能，以把他們的頭子這次不成功的暗殺行動的責任推定在我這方面。要做到這樣，他們可以選取的手段並不很多。他們不得不行使最粗劣的方法，並且用希特拉的格言給他們作指引：謊言愈大，入信愈易。

研究一下墨西哥某一類報章在企圖行刺後的一段日子裡的行為表現，可以對格柏烏在幕後的活動達成一些寶貴的結論。且讓我們把斯大林派的官方出版物《墨西哥之聲》，乃至這份刊物的種種前言不對後語、毫無意義的指責和尖酸的誹謗置諸不理；同樣的，對於那些要麼是由煽情媚眾作指引，要麼是想把這次襲擊取為己用，也就是為了一般地攻擊「左派」的右派喉舌，我們也將之置諸一旁。我在政治上之與《宇宙報》或《精進報》這類報章的距離之遠，要較倫巴度·托尼丹諾及其一夥更甚。我拿上述點名的報章來自衛，就有如我拿乘坐公共汽車以作為交通工具一樣。

再者，右翼報章的把戲，只不過是一國政治的反映；而且，在本質上，這些右翼報章對於襲擊和格柏烏的問題，採取了保持距離的態度。分析《民眾報》的行為及《國民報》部份的行為，這對於我們的研究目的是更為重要得多了。採取積極政策的是《民眾報》；《國民報》只是投它那些有利益牽涉的同袍之所好而已。

雖然有報章報道說，托尼丹諾在襲擊發生之前的2、3天已經離開了首都，但就在最關鍵的時刻，《民眾報》是有著非常清晰準確的指示的。襲擊並沒有使《民眾報》措手不及。編輯沒有在襲擊當兒將之譏為兒戲，也沒有指我有著什麼「被迫害狂」之類。正好相反，這份報章在當時立即採持了一種嚴肅及戒備的口吻。5月25日這天的頭條是全幅橫題：《行刺托洛茨基就是行刺墨西哥》。首席編輯在這一條新聞裡要

求當局作出最嚴格的調查，並對罪犯作出殺一儆百的懲罰，不管這些罪犯有著何種政治傾向和有著什麼外國聯繫。這篇文章的措詞力圖造出大公無私、深懷愛國而且義憤填膺的印象。它的即時目的，是要把《民眾報》與恐怖分子劃出楚河漢界；至於那些恐怖分子，倘非今天，便會在明天被警方擒拿住的。《民眾報》在早先一段時間裡曾經向我發動了一場如火如荼的誹謗攻勢，所以它現在這種防範措施，更是倍加必要。

不過，就在這種用文字修飾的公正外表之下，已經小心翼翼的埋下了引人遐思的伏筆；這些伏筆在隨後的數天裡便得到了進一步的引伸。文章是這樣的輕輕帶過一筆：「這次襲擊有著某種神秘莫測、令人可疑的方面」。這寥寥數語，在當時並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它們就這樣過了關。但現在完全是清楚不過的了：文章的作者，預先為「自我襲擊論」的可能性預留一筆，以便在司法調查落了空時可以拿來應用。文章的第二個伏筆的重大意義也不亞於前一個：它預測，「墨西哥的敵人」將會把行刺企圖歸咎於斯大林和莫斯科。墨西哥的敵人在這裡給等同於斯大林的敵人。呼籲搜捕不管有著什麼權勢關聯的罪犯——這麼莊嚴的號召，所得的詮釋卻是十分的有限。

這篇文章的迂迴曲折和閃爍用詞，是經過小心推敲的。文章本身的自相矛盾性，源出自當時局勢的自相矛盾性和不確定性。在那時，調查的結果仍是未知之數。為防調查會成功結案，有必要置身事外愈遠愈好。而要是調查落空，那便有必要保持行動的空間，可以自由走上誹謗迫害的老路子。與此同時，尚有必要把注意力引離開格柏烏愈遠愈好，但卻又不完全自縛手足。今日重讀這篇文章，可知斧痕盡現。

5月26日的《民眾報》上的文章，主要是承接前一天的路線。《民眾報》要求當局嚴懲有罪者。行刺的參與者或會立即落入警察手中的危險性，仍然是十分之高，所以便有這種不偏不倚的嚴苛呼聲。

《民眾報》在5月27日便已經刊出了《托洛茨基先生自相矛盾》這篇尖酸的文章。這是把關於襲擊的「可疑的方面」的伏筆加以發展的第一次嘗試。文章斷定，我對於突襲當時到底身在何處這一點，作出了自相矛盾的供詞。這種含沙射影的不得宜，可真教人瞠乎其目。要是一個孤零零地居住在外地的人是有能力的把20個密謀者動員起來，還能夠給他們提供警察制服和機關槍，那麼，對他在襲擊當時到底身在何處這一點，他也應該有能力預先準備一個答案。但且讓我們不要對偽造的技倆吹毛求疵了吧。事情很清楚：

《民眾報》是在給「自我襲擊論」的根據作出準備。

而就在同一時候，調查遇上了重大的困難：雜誌能夠未雨籌謀，預見到許多個方面，它能夠把它的行蹤掩藏得妥妥貼貼。從襲擊當天開始，已經過去了3天。就在這麼一段長時間裡，襲擊的主要參與者們有著充裕的時機，持著事前準備好的護照離開墨西哥的國境；所以，可以視他們已經沒有被捕的威脅了。

《民眾報》由此而相應地在5月27日採用了更大膽的口吻。在新聞頁裡，提到這宗事的已經不止於前面引述的那一則故事。5月27日的頭條文章乾脆聲稱，「隨著每天過去，行刺企圖喚起的重大疑問，看來是愈來愈有可疑，愈來愈不合邏輯」；尤有甚者，文章也提到「偽裝」這個字了。文章把行刺企圖歸咎為美帝國主義者謀求干預墨西哥，而且美帝國主義者又顯然是以我的合作為據點的。至於帝國主義者們的襲擊對象為什麼是我而不是其他人，該篇文章並無交代。而且，在墨西哥襲擊一個俄國的布爾什維克，是怎麼能令美國的干涉言之成理這點，也一樣是令人費解。這篇文章是用吵吵嚷嚷的字句來替代分析和證明。

尤須記取的是，在斯大林和希特勒結成同盟集團之前，《民眾報》已經用種種的方式把我描黑為納粹黨人。只是自從紅軍入侵芬蘭之後，我才突然變成了一個美國的特務。《民眾報》就像斯大林向他的人員發出指令一樣，隨心所欲的把我對待。托尼丹諾及其盟友的種種煽動言詞和幕後的手法，比起他們在報章上的所作所為，毫無疑問的是會更進一步。在隨後數天的事件中可見，他們在警察當中尤其大做手腳。

在5月28日，調查當局已經完全投向「自我襲擊」論的見解。我的2名秘書奧托和查爾斯，及與我家庭有聯繫的2位人士B.和S.受到逮捕。《民眾報》在取得勝利之後，小心翼翼的退身其事：它在5月28日該期，再一次保持了客觀的位置。報章的督印人為什麼要謹小慎微而非奮不顧身，這是清楚不過的。他們知道的內情比他們說出來的要多，他們對自我襲擊論的說法，比起被他們誘導到錯誤的軌道上的警察們，是更無多少信任的。他們唯恐這種說法將會隨時敗露。所以，當他們把執持自我襲擊論的責任轉嫁給警察之後，《民眾報》在5月28日便回復為一個保持警覺的愛國衛士的觀察者。

《民眾報》在5月29日這一期裡，不加評論的刊載了共產黨的聲明；這篇聲明竟然不是要求懲罰恐怖分子，而卻是要求把托洛茨基遞解出墨西哥。就在當天，我們的家居和所有住客，被一團狂熱的猜疑緊密包圍著，把我們和外在世界徹底切斷隔離。值得注意

的是，就是在這種場合，托尼丹諾也會把克里姆林宮最露骨的口號留交由共產黨領袖們來說述，而這些〔墨西哥〕共產黨領袖們是一無所失的。托尼丹諾為自己謀求一道撤退的橋樑。

6月1日的報章刊載了我致共和國檢察官的函件，信上公開的點名倫巴度·托尼丹諾，指他在襲擊的準備過程裡在道德上是個同謀犯。繼此之後，托尼丹諾露了半身。《民眾報》在6月6日宣稱，「墨西哥工人聯會指責托洛茨基在（美國佬攻擊墨西哥的）神經戰中作為工具而效勞」。這是什麼用意呢？這是一種毫無意義亦毫無事實根據的空洞言詞！托尼丹諾以「墨西哥工人聯會」的名義向當局提交了一份文件，這篇文件把該次襲擊編成一幅無邊無際而又極不明確的國際陰謀的圍網，涉嫌者除了我本人之外，還廣及其他方面、其他機構和其他個人。真是應有盡有，就是沒有格柏烏。我們已經知道，只有「墨西哥的敵人」，才會懷疑到格柏烏。托尼丹諾以其各種把戲保持他作為格柏烏頭號朋友的位置。

在5月25日該期，《國民報》的第一版甚至沒有提到行刺這件事，這與首都的所有其他報章迥然不同。它在第二版裡用以下這條題目刊出一則快訊：《托洛茨基在其居所被戲劇式的（！）行刺》。這份報章是根據什麼而得出這個評價，這仍是個未知之謎。不幸的是，我不得不確定，這份報章在此之前有好幾次在毫無根據之下，企圖把一些招人非議的行為推諉給我。

有一點尤值得人們細細的咀嚼：在《國民報》把行刺稱作「戲劇式的」同一天，《民眾報》的標題是《行刺托洛茨基就是行刺墨西哥》。驟眼看來，《國民報》似乎比《民眾報》對襲擊的受害者表現出更多的敵意。但事實卻非如此。《國民報》的行為只不過是顯露出它遠離斯大林主義的消息來源，結果也遠離襲擊的消息來源，比諸《民眾報》更甚。《國民報》有著盡其所能以圖討好斯大林派的編輯們；他們知道，最簡單乾脆的做法，就是說一些使我招人懷疑的說話。當編輯們收到有關我家受襲的消息，其中的一個編輯更立即靈機一觸，想到一條冷嘲熱諷的公式。正是這個事實，表明了《國民報》的編輯們並不知道他們自己在寫些什麼，而這和《民眾報》的編輯們是大異其趣的。

可是，應該注意的是，這兩份報章在翌日的線路是走在一道了。《國民報》從《民眾報》的行藏中，看到它自己可是太漫不經心地脫口說出了行刺企圖的「戲劇式」的推論，於是它急流勇退，採取一個較為

看守的位置。至於《民眾報》，它在確信行刺的參加者中沒有任何人被拘捕之後，開始轉移到「戲劇式的」行刺企圖的位置去。5月27日的故事《托洛茨基先生自相矛盾》，也在《國民報》同時刊出了。

* * *

所以，在經過以《民眾報》刊登的文章為基礎而作的分析，並把這些文章與《國民報》的文章作出比較參詳之後，可以確定的說，托尼丹諾是在事前知道行刺企圖的預謀的，哪怕他所知道的是最為一般的概況。格柏烏在同一時間裡——經過不同渠道——籌劃行刺的陰謀計策、政治防衛和令調查無從入手。《民眾報》在關鍵的日子裡，無疑是從托尼丹諾本人處接收指示。而且大概捨他之外，不會有其他人是5月25日該篇文章的作者。換言之，倫巴度·托尼丹諾在道德上參與了預謀行刺，並且在道德上掩蓋其蛛絲馬跡。

爲了對襲擊的背景及關乎調查的一些狀況有一個較為清晰的理解，便有必要就我的守衛說上幾句話。有報章的報道把我說成是把近乎陌生不相識的人「僱用」爲守衛，而那些守衛是爲了薪酬而工作云云。所有這些說法都是子虛烏有的。打從我流亡到土耳其以來，也就是說，幾乎12年來，這支守衛人員便已經存在。守衛人員的組成是視乎我所居住的國家而不斷變換，但其中有好幾個合作者是隨同我從一個國家移居到另一個國家。守衛經常是由年輕同志組成，他們由政治觀點的認同性而與我聯結一道，並且是由我那些較為年長、經驗更為豐富的友人從志願者當中選拔；而那些志願者從不患寡。

我所隸屬的運動是一支年輕的運動；這支運動是從來自莫斯科的寡頭集團及其在全世界的代理人史無前例的連串迫害下興起的。一般來說，歷史上再難找到另一支運動像第四國際那樣，在那麼短暫的時間裡折損了如許多的犧牲者。我個人深信，在我們這個戰火連天、充滿巧取豪奪、滿目破壞和各種各樣猙獰獸性的時代，第四國際是注定要履行一個偉大的歷史的角色。但這是未來的事。它的昔日只知道有打擊和迫害。過去12年來，沒有人會想望靠第四國際的幫助爲自己創一番事業。是出於這個理由，參加這個運動的人都是忘我、堅信，隨時準備把物質利益拋棄，更不惜在必要時把性命犧牲。我沒有意欲掉落到理想化中去，但我容許自己這麼說：在任何其他組織裡，是不大有可能像第四國際一般，有這麼一大群各式各樣的人那麼忠於自己的旗幟，那麼的無顧於個人的虛榮。我的守衛一向就是從這種年輕人中徵募得來的。

在墨西哥的守衛最先是由年輕的墨西哥朋友們構成的。但我不久便確信，這種安排有不便之處。我的敵人們有系統地試圖把我捲入墨西哥的政治，以此來使我無法停留在這個國家。而我那些年輕的墨西哥朋友們，他們既然住在我的家裡，時間一長久，便會相當程度上被看成是我的政治影響力的代理人。因此我不得不拒絕讓他們擔當守衛，並且用上外國人來替代他們；這些外國人主要是美國公民。他們全部經過我那些深富經驗的年長朋友挑選之後才派遣過來。

爲了徹底的清晰無誤，容我再補充一點，就是那些守衛員都不是由我來供養的（我沒有這種資源）；一個在朋友和同情者之間募集必要經費的特別委員會擔負了這方面的費用。我們——我的家庭和守衛們——生活在一個細小而封閉的公社，四堵高牆把我們和外在世界隔離開來。凡此種種狀況，足以說明我是大有理由信賴我的守衛，相信他們不會叛賣或犯罪。

而儘管有著所有這些防範，但若以爲這樣便絕對排除有個別的格柏烏成員潛身到守衛隊裡的可能性，這當然是不可能的。調查打從一開始便對那個被擄走的守衛羅伯特·舒爾敦·哈特抱有懷疑，把他視作襲擊的同犯。我這樣回答：要是舒爾敦·哈特是格柏烏的特務，他滿可以在夜間把我殺掉然後跑掉，而毋須勞動到20個人眾，使他們所有人都冒上重大的風險。再者，就在襲擊發生的前一天裡，舒爾敦·哈特整天在忙著購買小鳥兒、修理鳥籠，給鳥籠髹漆等等這類閒事。有關於指稱舒爾敦·哈特是個格柏烏的說法，我仍未聽到哪怕一個引人入信的論句。因此，我從一開始便向我的朋友宣佈，我會是最後一個相信舒爾敦·哈特是有份參與突擊的人。而設若我的所有假設都被推翻，舒爾敦·哈特的參與確是得到印證，那麼，這在本質上亦無改變突擊的整體屬性。格柏烏在守衛員之一的協助或沒有守衛員的協助下，組織了把我謀殺及把我的檔案庫焚毀的陰謀。這就是這宗案件的精髓。

共產黨在其正式的宣言中一再重申，個人恐怖不入其行動的系統云云。沒有人假設這次襲擊是由共產黨組織的。格柏烏利用共產黨，但格柏烏絕非和共產黨融爲一體。

在有可能參與突擊的人當中，據熟悉共產黨黨內生活的一些人提到，其中有一個人，他早年被開除出黨，後來因回報他對黨的某些服務而給恢復黨籍。從調查格柏烏的犯罪手法的角度來看，「被開除」的這個類別一般都是深富興味。斯大林幫在對付蘇聯反對

派的首個時期，通常都特意把最不穩定的反對派成員開除出黨，把他們陷入物質極度艱難的境地，從而讓格柏烏有機可乘，把他們招納，以在反對派內作特工。這個手法在後來達至完善，並推而廣之運用到第三國際所有的黨。

被開除者可以分為兩個類別：一些人是由於原則性的分歧而離開黨，他們不再與克里姆林宮為伍，轉而尋找新的道路。另一些人是由於處理經費不當，或犯有道德上的罪過，甚或是被指稱犯有這種罪過而給開除。這第二個類別中的大多數人，他們已經緊密地依附到黨的機器，他們已經沒有能力幹其他工作，並且已經習慣於特權的位置。像這一類的被開除者，他們構成了格柏烏寶貴的材料，可以被變作唯命是從的工具，擔當最為危險、最為無惡不作的勾當。

墨西哥共產黨的長期領袖拉波爾特最近被開除出黨，作為開除的根據是一項最為險惡的指控：拉波爾特這個人貪污舞弊，出賣罷工，甚至收取「托派」的賄金。可不過，最教人嘖嘖稱奇的一點，卻是拉波爾特竟然對那些極盡羞辱性質的指控甚至不試圖作出辯解。這麼一來，他便表現出，為了某些即使他本人也不敢反對的神秘的目的，把他開除是有必要的。尤有甚者，拉波爾特利用第一時間，在報刊上宣佈他對黨不可動搖的忠誠，即使被開除了出黨也復如此。許多在同一時候被開除出黨的人，也遵循了這同一個戰略。這些人是可以幹出任何事情的。他們將會執行任何命令，作奸犯科，務求不會失去黨的垂青。還有可能的是，他們中的一些人之所以被開除，是為了在預謀期間把襲擊的參與者先行移離出黨，以讓黨不致沾上任何責任。至於開除什麼人、利用什麼口實，則是由藏身在幕後的格柏烏最為信賴的代表人來發出指示。

把這一場謀殺編造為墨西哥工人突然起而自發的把「人民之敵」嚴懲處辦，並以此方式來向全世界的工人呈示，這對斯大林會是大為有利的。從這個角度來看，值得注意的是格柏烏很熱衷地一而再的，不惜一切代價以把我和競選墨西哥總統的那個候選人阿爾馬桑將軍聯繫起來。由托尼丹諾和共產黨領袖發佈的連篇聲明，相當清楚無誤的披露出這個策略計謀：尋求一個有利的口實，或是創造一個有利的口實，以讓他們能夠執起武器來對付敵人；而在這張敵人的名單上，我大概不會是叨陪末席的一個。該無疑問的是，在「墨西哥工人聯會」的工人民兵裡，是有一支由格柏烏創設的秘密突擊隊，由之擔任最危險的勾當。

我在報章上利用每一次場合，反覆要求設立一個

公正無私的調查委員會，以檢驗所有虛假的報告；我這個要求是為了防微杜漸，及時制止上述的計謀。不過，即使沒有一個調查委員會，墨西哥的公眾輿論直到今天為止顯然都對那些誹謗予以拒斥。按我所能判斷，斯大林派迄今還未能在工人圈子中挑起對我的仇恨。與此同時，斯大林已經厭倦於守候「民眾義憤」的爆發，格柏烏遂接到他的號令，還是要重施故技，用回更因循和直接的手法來行事。

如此小心謹慎而又幹練的突擊，竟然出乎意外地落了個空，這是對斯大林的一個重大的打擊。格柏烏必須在斯大林跟前恢復名譽。斯大林必須展示他的權勢。再一次行刺的企圖必然會捲土重來。會是用什麼方式呢？很有可能是又一次純然的恐怖行動，機關槍和炮彈兼施。但也完全不能排除他們會用捏造的「民眾義憤」的手段來為恐怖行動作掩飾。墨西哥的斯大林特務之所以發動愈來愈惡毒的誹謗運動，正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

克里姆林宮為了證明其對我的迫害是正當的，同時也為了掩飾格柏烏的襲擊行動，它的代理人大談什麼我的「反革命」傾向。這就端視乎人們怎樣理解革命和反革命了。在我們這個時代，帝國主義是最強大有力的反革命，不論它是以法西斯的形式或是披著假民主的外衣。沒有任何一個帝國主義國家願意容許我留在其領土。至於那些受壓迫的或半獨立的國家，它們或是在帝國主義的壓力下，或是在莫斯科官僚層的壓力下，拒絕把我接納。這個莫斯科官僚層，目前在整個世界裡發揮著極之反動的角色。墨西哥對我客氣相待，乃因墨西哥不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由於這個緣故，墨西哥政府作為一個罕見的例外，證明是足有不受外來壓力的獨立性，能夠按照其自身的原則作指引。所以，我可以聲明，我在地球上活著不是依循常規，而是依循常規的例外。

活在我們這個如許反動的時代，革命者不得不逆流而上。我是竭盡所能，全力以赴。我個人的命運，及與我親近的人的命運，大抵是最無情地表述了世界反動的壓力。我全然不會將之看成是我個人的功過：它是由千絲萬縷的歷史情勢揉合而成的結果。不過，當托尼丹諾、拉波爾特這一類人等把我宣佈為「反革命者」，我會是處之泰然，留給歷史作最後的裁決。

（李時譯自《托洛茨基文集，1939-40年》）

註：阿爾馬桑（Almazan）是1940年墨西哥總統競選中的右翼候選人。

Market economy induces severe industrial hazards

Zhang Kai

With China keenly pressing ahead the market economy which goes after optimum economic "efficacy", labour safety has become a critical issue. Lately,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forced to embark on a national inspection of production safety in an attempt to contain major accidents and hazards.

The Emergency Circular issued by the State Council on 7 August 2000 pointed out the gravity of the problem. Within a period of ten days in late June 2000, a series of major accidents had occurred: 130 people died in a ship wreck in Hejiang County, Sichuan Province on June 22; 49 people died in a plane crash of the Wuhan Airline Company; 38 people died in an explosion of a fireworks factory in Jiangme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on June 30; 10 people died in an explosion of a firecrackers factory in Dianjiang County, Chongqing Municipality.

For years, industrial and traffic accidents have been rampant, with a mortal casualty of around 100,000 people every year. Of this, about 16,000 were workers whose deaths were induced by industrial and mining accidents. China's output of raw coal is about one-fifth in the world's output, yet the casualty figure is four-fifths of the world's casualty figure.

According to the State Coal Industrial Bureau, every year, there are about 70 incidents of mining accidents in which over 10 people died. This means an incident every five days. In 1996, coal output in China was 1.374 billion tons, with 10,015 mine workers dead in accidents. In the USA, the figure was 38 deaths for a coal output of 0.96 billion tons. In 1998, China's output was 1.22 billion tons, with 7,377 workers dead in accidents. The death rate was 6.04 persons per 1 million tons of coal output. The casualty rate in China was 200 times that of the USA.

Incomplete statistics show that there are around 380,000 hazardous or poisonous industrial enterprises in China. According to a survey conducted by the Health Ministry on 1,426 foreign invested enterprises, 37.2% involved occupational hazards in 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 and 34.7% of workers were exposed to such hazards. Up to the end of 1998, pneumoconiosis patients in the whole country amounted to 550,000, of which 130,000 have died. This equaled the total number of pneumoconiosis patients in the whole world. In China, the patients are growing at a rate of 15,000 to 20,000 a year.

The number of people poisoned was also big. According to incomplete statistics by the health authorities, occupational poisoning took the lives of hundreds every year, and jeopardized the health of thousands. In 1999, the number increased by 47% as compared to 1998.

Apart from the lack of legislature to monitor occupational health problems,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small and medium township enterprises in violation of production safety and health standards has been very acute. According to a survey of the Health Ministry in the early 1990s, industrial hazards existed in 83% of township enterprises, 34% of workers in township enterprises were in contact with dust and poisonous stuff, and occupational hazard patients amounted to 15.78% of the workforce.

Another major hazard is the danger of the same building housing the factory, warehouse and workers' quarters. Fires have broken out and the casualties have been high. Some examples are: on 19 Nov 1993, a fire broke out in Zhili Toy Factory in Shenzhen and 83 workers were killed; on 16 June 1994, a fire broke out in Yuxin Dyeing and Textile Factory in Zhuhai and the next day the building collapsed, causing 93 deaths.

Long working hours, fatigue and lack of safety protection equipment have also caused numerous accidents to occur. According to a report by *Yang Cheng Evening News* on June 19, quoting *Nanjing Daily News*, in two townships in Leqing City, Zhejiang Province, privately run enterprises use cheap and unsafe machinery. The two hospitals in Leqing City had a record of stitching severed fingers for 14 workers per day, treating over 5,000 workers during the year. The *Workers Daily* on March 2 also reported on the situation in a "village of severed fingers", where in a village alone were hundreds of casualties, "and it was said that severed fingers could fill up a basket".

There may be a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hundreds of thousands victimized by industrial hazards and accidents and the high suicide rate in China. *Shenzhen SEZ Daily* reported on May 27 that the suicide rate in China ranked high in the world, with 19.58 out of 100,000 population (the world figure was 15.23 out of 100,000). Of the world's suicide cases, 42% happened in China.

The *Workers Daily* of March 13 reported that some employers signed "Life and Death Contracts" with workers, stating that workers would receive only wages but no compensation for whatever injuries or casualties they might suffer. As most workers in lowly paid and hazardous jobs are peasants from the countryside, they constitute a vulnerable labour force and a vast reserve labour army, and the ill or injured are simply sent back home. They are not covered by either the medical insurance schemes or labour insurance schemes. According to reports of newspapers in mainland China, the fees of medical care have soared in the last decade. In the early 1990s, the average outpatient fee was 10 yuan (US\$1.20) and hospitalisation fee was 400 yuan. By 1997, they were respectively 60 yuan and 2,300 yuan. In addition, 80% of the state's medical and health resources are in urban cities, with two-thirds concentrated in large hospitals. It has become simply unaffordable and unavailable to the rural working masses.

Before the economic reform of 1978, workers were lauded as the master of the country, even if sometimes it was lip service. The economic reform has given autonomy to the management of the enterprises, and now it is difficult to find even propaganda about workers' rights or workers' power in the enterprises and in society. Trade unions are powerless on matters of occupational health or safety. The Labour Laws cannot offer protection. With such intensification of contradictions and tensions, it requires the effort of both workers and groups working for workers' welfare to improve on the situation and fight for workers' rights.

20 August 2000

OCTOBER REVIEW VOL.27 ISSUE 4 2000.10.15

HONG KONG

- 2 In solidarity with persecuted students..... Editorial
3 Immediately revise notorious Public Order Ordinance!..... HKFS
4 Strongly condemn government political persecution!..... 32 Groups
6 Stop interfering in academic freedom..... Jun Xing
8 Old wine in old bottle for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Zhen Yan

LEUNG KWOK HUNG ELECTION SPECIAL

- 10 Election Manifesto.....
11 Election Program Extracts.....
11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11 Why the need to end one-party-rule?.....
12 Leung'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12 Leung's record of struggle.....
12 10 reasons to support Leung.....
13 SAR Government violation of labour rights.....

TAIWAN

- 14 After 50 years, Nationalist Party loses the Presidency..... T.Barrett

CHINA

- 18 Market economy induces severe industrial hazards..... Zhang Kai
22 Official thieves..... (reprint) Wang Kejiang
23 Three questions about imperialism..... G.Achcar
25 The Dover Tragedy..... Class Struggle

INTERNATIONAL

- 27 Japan wants to drop Peace Constitution for war power... (tr) Feng Kerui
29 The current state of US Army in Korea Agreement..... (tr) Zhao Jing
30 Japan wants to annex Okinawa..... K.Kunitomi
32 Down with new Labour Code!..... All-Russian Campaign Committee
33 Days of protests in Russia..... (tr) Yang Ping

HISTORICAL STUDIES

- 34 Stalin seeks my death..... L.Trotsky

ARTICLE IN ENGLISH

- 42 Market economy induces severe industrial hazards..... Zhang Kai

十月評論

October Review

第27卷 第4期 (總第202期)

2000年10月15日出版

出版人：十月書屋

編輯：十月評論編輯委員會

督印人：陳昌

地址：九龍觀塘敬業街65號敬運工業大廈14樓N座

電話：9846 3428

傳真：2346 5268

通訊處：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0144號

電郵地址：or@earthling.net

Address：G.P.O.BOX 10144, HONG KONG

Tel.No.：(852) 9846 3428 Fax：(852)2346 5268

E-mail Address：or@earthling.net

【十月評論內一切具名文章，並不一定代表編輯部立場】

承印：藍馬柯式印務有限公司

地址：魚涌華蘭路十四號

益新工業大廈16字樓C座

電話：2563 1068

定閱：(本地) 每年港幣八十元

(外地) 平郵：每年US\$15

空郵：亞洲US\$18

其他US\$22

Subscription Rates:

Hong Kong: HKD\$80 per year

Overseas Surface Mail: US\$15 per year

Air Mail (Asia): US\$18 per year

Air Mail (Others): US\$22 per year

目錄

香港

- 2 聲援學聯同學，爭取修改公安條例！.....社論
- 3 和平示威是公民權！立即修改公安惡法！.....香港專上學生聯會
- 4 強烈譴責政府政治迫害！.....32 團體及 205 位人士聯署
- 5 抗議鎮壓學運！反對惡法治港！.....343 位人士聯署
- 6 徹查及防止對學術自由的干預.....軍行
- 8 立法會新瓶舊酒.....振言

梁國雄 參選專頁

- 10 （長毛）梁國雄參選宣言
- 10 我為甚麼參與立法會選舉？
- 11 選舉政綱略要
- 11 為何要結束一黨專政？
- 11 中共十大違反人權事件簿
- 12 長毛的抗爭歷程
- 12 梁國雄的過去、今日與未來
- 12 十大理由支持長毛
- 13 長毛答客問
- 13 董建華施政失誤事件簿
- 13 特區政府違反勞工權益事件簿

台灣

- 14 台灣人民的決定必須受到尊重！.....巴勒特

中國

- 18 市場經濟導致生產很不安全.....張開
- 22 官賊論.....（來論）王克江
- 23 中俄新關係及與帝國主義間的關係.....阿舍卡爾
- 25 資本主義殺人累累——從多佛港悲劇談起.....《階級鬥爭》

國際

- 27 日本又為棄改和平憲法、復行戰爭權力大造輿論.....高島義一
- 29 駐韓美軍地位協定的現狀.....趙京譯
- 30 沖繩允許美軍基地存在、讓沖繩從屬及合併於日本的論調. 國富建治
- 32 不要新的勞動法！.....全俄保衛現存勞動法行動協調委員會
- 33 俄羅斯的抗議浪潮.....《工人國際報》

歷史

- 34 斯大林謀害我的生命.....托洛茨基

英譯

- 42 Market economy induces severe industrial hazards.. Zhang Kai